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七十九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九十七年三月

周口店發掘時代的一名法國顧問——以新近出版的德日進書信集為基礎材料的研究

戴麗娟*

在歐洲自然科學發展史的領域裏，目前已有較多研究以具有決策性角色和整合性功能的博物館等科研機構為分析對象，但是對於被博物館外派到世界各地採集標本的人員，尤其是這些人員在田野當地的工作情況，由於缺乏系統性的檔案資料，目前所投入的研究較少。

本研究利用新近出版的一份書信集為基礎材料，藉著閱讀德日進在華期間寄給其指導教授步勒之信件，對德日進來華背景、加入周口店考古計畫之因緣、與當時中國及國際學者之互動情形等加以分析，尤其著重於探討這位法國學者在抱著短期工作的心態來到中國田野，因為長期居留後，而在心靈與智識上所產生的變化。

論文以該書信集涵蓋的年代 (1923-1940) 為範圍，分為兩個時期來討論。第一個時期 (1923-1927) 是德日進作為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外派人員的時期，論文以德日進對法國博物館的效忠與依賴、對國際競爭壓力的感受和因應、對中國地質型態的陌生與初步掌握等面向為主線來進行討論。第二個時期 (1928-1940) 是德日進加入周口店考古計畫，並且逐漸成為國際級亞洲考古專家的時期。由於工作條件與身分的改變，德日進在此時期雖然對於法國參考資料與鑑定知識仍有一定程度的依賴，但是原有的主從關係趨淡，取而代之的工作型態是以中國田野為基地，增加與中國及其他國際學者的合作機會，並且根據中國田野逐漸累積的考古成果，試圖建立屬於當地的史前文化參考座標，而不再滿足於十九世紀流傳下來，以歐洲地質特徵所建構的分期框架。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透過此個案研究，本文試圖分析歐洲外派人員與其中心科研機構的多變關係，同時亦藉此觀察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考古科學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的各種中外合作模式，希望為未來可能進行的比較研究建立法國部份的基礎認識。

關鍵詞：德日進 法國古生物考察團 周口店考古計畫

壹・前言

二十世紀二〇年代周口店北京猿人的發現，不僅是中國史前考古學史上的盛事，也是世界史前考古學亞洲篇中可誌的一頁。當時非洲史前考古的潛力尚未受到重視，國際考古學界盛傳的是「人類起源於中亞」的假說。[1] 透過在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陸續展開的挖掘工作，學界對此問題的討論逐漸脫離推測階段，而且隨著化石資料的增加，得以不斷修正人們對亞洲史前時代的認識。周口店發掘的重要性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周口店遺址的初次發現與發掘，緣起於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 (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 職業上的興趣與警覺。[2] 一九一四年，安特生受邀爲中國政府農商部的礦政顧問，任務是協助政府開展煤田及其他礦產調查。一九一六年，丁文江 (1887-1936)[3] 所推動的中國地質調查所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4]

---

1 一九二〇年代曾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和研究工作的葛利普 (Amadeus William Grabau, 1870-1946)、奧斯朋 (Henry Fairfield Osborn, 1857-1935)、馬修 (William Diller Matthew, 1871-1930)、步達生 (Davidson Black, 1884-1934) 等人都支持這個假設，相關論點見 Davidson Black, "Asia and the Dispersal of Primates,"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中國地質學會誌 4.2 (1925): 133-183.

2 有關安特生到中國工作的背景、經歷和貢獻，可參考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北京：三聯書店，1997），頁87-93；Magnus Fiskesjö and Chen Xingcan, *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004)，此書為英、中雙語版。

3 有關丁文江的生平，早期較完整的研究當屬胡適編，《丁文江的傳記》（臺北：中央研究院，1956）以及 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此書晚近已有中文譯本出版：費俠莉 (Charlotte Furth) 著，丁子霖、蔣毅堅、楊昭譯，《丁文江：科學與中國現代化》（北

成立後，雙方開始密切合作。安特生對中國「龍骨」，也就是化石殘骸的興趣，讓他在一九一八年輾轉發現了周口店附近雞骨山，並確認了周口店遺址。但是經過一九二一年和二三年的試掘，安特生希望找到遠古人類遺骸的願望並沒有立即實現，挖掘工作也因此暫時中斷。直到一九二六年，前後挖掘成果中的兩枚牙齒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 (University of Uppsala) 被鑑定爲可能是遠古人類的牙齒，並在同年十月瑞典王太子訪華期間公諸於世，周口店遺址的潛力才重新得到國際學界的重視。與安特生合作關係密切的北京協和醫學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in China) 解剖系主任，加拿大人類學家步達生[5] 因此提議由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出資支持周口店遺址的系統發掘，並且建議設立一個體質人類學研究機構，由中外研究者合作進行。[6] 與當時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 (1889-1971) 商討後的結果，這個專門研究第三紀和第四紀堆積的新機構就成爲地質調查所組織下的新生代研究室 (Cenozoic Laboratory)。周口店發掘計畫於

京：新星出版社，2006）。另外，有關丁文江任淞滬總辦時期所留下的一批文電，原本下落一直成謎，晚近幸賴何漢威教授的研究和整理，學界對此批資料已有進一步認識；見何漢威，〈史語所藏丁文江檔案的收藏原委、編輯整理及史料價值舉隅〉，《古今論衡》12 (2005)：3-34。

[4] 地質調查所之外文名稱為：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對內則因所隸屬的部門名稱多次更動，曾先後冠以工商、農商、農礦、實業、經濟部等名稱，後來又因地方性的地質調查所陸續成立，這個具有全國性的地質調查所因此被稱為：中央地質調查所。為行文流暢起見，本文僅以「地質調查所」稱之。關於地質調查所的歷史，讀者除了可參考該機構早期出版的資料，例如：中國地質調查所，《中國地質調查所概況》（北平：中國地質調查所，1931）；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央地質調查所概況：二十五週年紀念》（四川北碚：中央地質調查所，1941）；亦可參考晚近研究，例如：王仰之，《中國地質調查所史》（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1996）；程裕淇、陳夢熊主編，《前地質調查所 (1916-1950) 的歷史回顧：歷史評述與主要貢獻論文集》（北京：地質出版社，1996）；張九辰，《地質學與民國社會：1916-1950》（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

[5] 步達生於一九一九年受邀到北京協和醫學院任職，一九三五年因心臟病突發死於研究室。他也是最早 (1927) 大膽地憑著三枚牙齒化石就提出「中國猿人北京種」(*Sinanthropus pekinensis*) 這個新屬新種分類的學者；見 Davidson Black, "On a Lower Molar Hominid Tooth From The Chou Kou Tien Deposit," *Palaeontologia Sinica* 中國古生物誌, ser. D, 7 (Peking, 1927), 1: 1-22. 這份重要的鑑定報告中文版由李濟節譯：《周口店儲積中一個荷謨形的下臼齒》（收入《古生物誌・丁種・第七號》〔北京：中央地質調查所，1927〕，第1冊）。上述屬種名稱在李濟譯文中為：支人屬北京種。

[6] 賈蘭坡、黃慰文，《周口店發掘記》（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頁22；王仰之，《中國地質調查所史》，頁28。

一九二七年取得洛克菲勒基金會之贊助後隨即展開，新生代研究室則在一九二九年四月才正式成立。研究室組織章程中，[7] 以丁文江爲名譽主持人，步達生擔任名譽主任，副主任則由中國古生物學家楊鍾健 (1897-1979) 擔任。本論文研究的主要對象德日進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 也是在這個時候被延攬爲該研究室的名譽顧問。

在眾多曾經參與周口店工作的外籍學者中，[8] 德日進擔任的是古生物學方面的顧問。不過，他最初來華的原因卻與周口店這個中國最大規模的考古工作完全無關，[9] 而是爲了支援另一名法國耶穌會士桑志華神父 (Émile Licent, 1876-1952) 的田野工作，於一九二三年被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的步勒教授 (Marcellin Boule, 1861-1942) 派到中國。原本規劃的外派任務只有一年，卻因爲種種因緣際會，德日進從一九二三年五月首次來華，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回歸法國，在中國前後駐居了二十三年之久。[10] 本論文所使用的

---

[7]《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組織章程》內容如下：「一、本研究室的宗旨為發展一項廣泛的人類古生物學調查計畫。採集、研究和描述中國第三紀及第四紀的化石均為本研究室的目標。本研究室尤其關注人類生物學方面的問題。二、本研究室的行政事務置於地質調查所所長管理之下，並由下列人員予以輔助：丁文江博士為中國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譽主持人；步達生博士為研究室名譽主任；楊鍾健博士（或另一名中國古生物學家）為研究室副主任，專門從事古生物學部份而不是人類學部份的研究工作；其他專門人員可由地質調查所所長指定或邀請參加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三、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專款，通過北京協和醫學院分批撥給新生代研究室使用。四、一切採集的材料包括人類學標本在內，全部歸中國地質調查所所有，但人類學標本將暫時委託北京協和醫學院保管以便於研究。當標本保存在地質調查所時，亦應隨時為協和醫學院的科學家們提供研究上的方便。一切標本均不得運出中國。本新生代研究項目不涉及文化的研究並將不採集歷史文物，不論何時，若偶然發現的歷史文物，將交給適當的中國的博物館。」轉引自賈蘭坡、黃慰文，《周口店發掘記》，頁40。

[8] 賈蘭坡、黃慰文，《周口店發掘記》，頁205中提到，除中國學者以外，至少有七個國家的科學家參與。

[9] 周口店考古為中國當時最大規模的考古活動，是根據陳星燦的說法；見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頁111。

[10] 在這段期間，德日進曾經數次返回法國或前往亞洲、非洲地區從事短暫考古活動。根據現存較詳盡的德日進傳記 Claude Cuénot,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Paris: Plon, 1958)，以及 Arnaud Hurel and Christophe Comentale, "Les premières missions paléontologiques françaises: 90 ans de recherches franco-chinoises dans le domaine de la géologie du Quaternaire et de la paléoanthropologie," *Dossiers d'Archéologie* 292 (2004): 26. 他在中國居留期的詳細月份如下：一九二三年五月至二四年九月、二六年六月至二七年八月、二九年三月至三

基礎材料便是德日進在一九二三至四〇年旅華期間與其恩師步勒來往書信之結集，共收錄了他寫給步勒的九十封信，其涵蓋的時期因此不只是德日進實際參與周口店工作的時期，也包含了所謂的法國古生物考察團時期。書信集中所收錄的信件大多是第一次公開，而且，不只收錄信件文字，也包含原信中附寄的地層白描圖或地層生物對應表草稿等等。[11] 因此，有別於以往曾經出版的德日進致親友書信集，[12] 這份師生之間的書信集特別富有科學史的研究價值。

在這份書信集裏，田野發掘成果與當時中國疆域內其他考古新發現等等，佔有相當的篇幅，尤其是在一九二三至二七年這段時期內，德日進因爲外派任務的身分，在信中對其田野觀察有著鉅細靡遺的描述。不過這些發掘內容其實都在當時以長短不等的田野報告形式，發表在法國與中國的刊物，若再加上後人研究所做的結論更新，這些研究成果本身其實未必是這份書信集所能夠提供給今日研究者最寶貴的訊息——因爲閱讀那些早已發表的研究報告應該會讓我們更直接瞭解這些成果的內容；反而是那些我們在已發表的正式文章或其他類型的檔案資料中較不易看到的其他敘述，例如醞釀中的想法、實作上的考量等等，可能才是這份書信集會讓學術史研究者感到有趣之處。事實上，在一封又一封給老師的信中，田野踏查的困難、研究經費的壓力、其他國家團隊的刺激或競爭等等，這些在正式發表文章中不會提及的面向，都在德日進筆下所流露出的自信、挫折、困惑、

〇年九月、三一年三月至三二年九月、三三年三至六月、三三年十月至三五年五月、三六年二月至三七年二月、三七年九至十二月、三八年五月至四六年三月。

[11]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1923-1940)*, ed. Amélie Vialet and Arnaud Hurel (Paris: Les Éditions du Muséum; Aix-en-Provence: Éditions Édisud, 2004). 這些信大多數屬於古人類學中心 (Institut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 所收藏的檔案資料。由於德日進本人沒有留信的習慣，所以此書信集內事實上僅收錄德日進寄給步勒，由步勒保存下來的信件，而沒有包括步勒寫給德日進的回信，不過，從德日進之信中仍可讀出雙方溝通之主要內容。

[12] 例如，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Lettres de Voyage (1923-1939)*, ed. Claude Aragonnès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56); *Genèse d'une pensée: Lettres 1914-1919* (Paris: Grasset, 1961); *Lettres de guerre inédites*, ed. François Guillaumont (Paris: OEIL, 1986); *Lettres de Chine: mission d'exploration Citroën-Centre-Asie, Groupe Chine de la Croisière jaune: 1931-1932*, ed. Jean-Louis Dodeman (Paris: Épigones, 1991). 除了以上這些與親友來往之書信外，與中國史前考古學相關的僅有一本收錄安特生與德日進來往十餘封書信的集子：*Dans le sillage des sinanthropes: lettres inédites de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et John Gunnar Andersson, 1926-1934*, ed. Pierre Leroy (Paris: Fayard, 1971).

自我激勵中浮現出來。有時連思鄉的心情也與歐洲考古學所提供的參照系譜有所呼應。[13] 在閱讀這樣的書信集過程中，我們看到一個外派人員如何排除旅途困難，將田野遭遇與所得，忠實地回報給身在學術中心的權威學者，最後還要將挖掘到的化石標本安全送抵中心學者主持的研究機構，才算任務完成。對照於科學史家 Bruno Latour 在其 *Science in Action* 一書中所揭示的科學操作模式——歐洲自然科學發展是建立在以世界爲範圍的長程資料蒐集網絡與首都博物館等科研機構（計算中心）所構成的有效連結上——[14] 德日進在中國初期的作爲，以及他和老師步勒的互動關係，實爲此模式提供了一個絕佳例證。然而，外派人員在田野當地所遭遇的種種在計算中心所不能預測的變化，也很可能使得原本規劃的長程網絡驟然中斷，而必須另做調整。德日進在中國後期的際遇正提供了一個可以由此角度觀察的例子。究竟這樣一位歐洲學者因爲短期外派工作到了中國田野後，因緣際會下加入了中國當地的長期發掘計畫，在其工作心態、專業思考與實際操作面上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他與原本隸屬的法國學界之關係有何改變？他對於當時新興的中國考古社群又有何看法？這些便是本論文希望藉著這份書信集所提供的材料來分析的主要問題。

同時，這個研究進行的過程中也觸及另外兩個層面的問題，其問題規模與所需爬梳的材料都超出目前這篇專題論文可以處理的範圍，卻是值得研究者納爲整體思考及未來進一步研究的對象。這也是爲什麼本文雖不能完整處理這兩個問題，仍然在必要時提及。第一，研究德日進與其他外籍學者參與周口店發掘工作的這段歷史，讓我們必須更細緻地思考當時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的環境。事實上，從遺址之發現到計畫性地發掘，周口店的發掘計畫是在中國軍閥割據、蔣介石北伐、九一八事件、蘆溝橋事變等事件交織而成的政治背景下進行的。大環境的動盪是可想而知的。相形之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爲該發掘計畫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定的根據地。其中，丁文江、翁文灝、楊鍾健、裴文中 (1904-1982)

---

[13] 由於德日進與步勒都生長於法國中央高地 Auvergne 地區，兩人曾經一起考察該地的考古遺址。德日進從中國寄給老師的信中偶爾會提到該地區的自然景致，讓步勒對中國田野有想像的依據；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p. 125, 174, 175, 278.

[14] 有關「計算中心」及「長程網絡」的概念，參見 Bruno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六章。

等中國學人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規劃與執行的角色；不過，若沒有外籍學者和外國基金會在知識、技術和資金上的協助，以當時中國考古科學的發展條件和國家財務狀況，如此龐大的發掘計畫幾乎是不可能啓動，即使啓動，恐怕也無法貫徹到底，更不用談到成果的累積。有了這樣的認知後，便可發現從世界史前史、國際考古學的角度來分析這段時期中國考古發展的必要性。研究者若能從不同參與國的角度來回溯這段歷史，不僅可以瞭解外國研究者如何組織其在中國田野的考古工作，以評斷不同組織方式對中外相關學術發展的利害得失，也可避免從中國本位的眼光來回顧這段原本具有國際性格的發展過程，逕將外國考古者一律視爲掠奪者，因此忽略實質且客觀的研究。[15] 事實上，當初的開創者如丁文江等人，懷抱難得的國際視野，懂得善用客卿來彌補中國人才缺乏的窘境，在短時間內爲中國地球科學及考古科學打下基礎，後人若不能還原這些研究領域當時既「在地」，又「國際」的氛圍，恐怕難以瞭解許多「洋顧問」，[16] 或賈蘭坡所謂「忘記了自己國籍的人」[17] 在華工作終老的心理曲折。在幾個主要參與國裏，目前對於瑞典參與的部份，尤其是有關安特生的部份，在中國學者陳星燦與瑞典學者馬思中 (Magnus Fiskesjö) 的努力下，我們已經有了比較多的瞭解。[18] 對於美國紐

[15] 許多討論民國時期外國人於中國進行考古調查的文章，在陳述調查結果之後，皆不免將這些事例評論為外國列強趁帝國主義之便而掠奪中國文物的又一實例。其中賈蘭坡與陳星燦等人則是採取比較持平的看法。陳星燦認為，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些探險家和考古學家「有意無意都成了帝國主義的幫凶」，但是又認為「必須將政治與學術分開」，「外國學者的探險和考古活動，不僅對於中國考古學的誕生有刺激和促生作用，而且為古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最主要的是，在中國史前考古學萌芽時期，與西方人合作，「讓初起的中國考古學避免了許多彎路」；見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頁50, 51, 109。

[16] 此名詞乃借用 Jonathan D. Spence,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67) 中譯本所用之名詞；見史景遷著，溫洽溢譯，《改變中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4），頁6。「洋顧問」這樣的名詞本身起源已不可考，但是在被使用時，似乎並不總是正面意義。

[17] 見賈蘭坡、黃慰文，《周口店發掘記》，第十六章論述步達生在華作為時所用的標題。

[18] 除了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和 Fiskesjö and Chen, *China Before China* 兩本書之外，還可參考陳星燦、馬思中，〈蒙德留斯與中國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686-695；陳星燦，〈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的重要文獻：安特生致瑞典皇太子的信及其釋讀〉，《古今論衡》8 (2002)：10-17；Magnus Fiskesjö, "The Sweden Connection: Swedish Archaeologists in Chinese Archaeology," 鄧聰、陳星燦編，《桃李成蹊

約自然史博物館所組成的中亞考察團 (Central Asiatic Expedition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的部份，除了當事人所留下的部份書寫之外，尚缺乏專門的整體研究。[19] 在法國參與部份，本篇以德日進書信集為基礎材料的論文只處理了部份的問題，至於桑志華神父如何組織其在中國的田野踏查工作，乃至於北疆博物院的設置等問題，則只能留待後續的文章來討論。[20]

第二個層面的問題則與德日進研究的整體狀況有關。對於德日進這樣一位對西方當代神學思想有一定影響力，又與中國近代科學發展有相當淵源的外國學者，現有的研究並不算少，但是多集中在其神學思想方面的討論或整理。在華文的部份，在現有的介紹性及翻譯著作中，人文研究者多半概略描述其哲學與神學方面的思想，對於其自然科學方面的研究甚少討論。[21] 從事中國地質研究的學者在回顧德日進相關研究時，則多半集中在他對中國古生物學研究的整體貢獻上，[22] 對於他來華的背景，以及加入周口店考古計畫之前的那段工作情況，則討論不多，所提供資料亦屬零星片段。[23] 至於德日進在法國被研究的情況，則與其思想作品在一九六〇年代引起廣泛討論有關。由於德日進那些帶有演化論色彩的神學作品在其生前遭禁，一直到他一九五五年過世後才被陸續出版，短時間內吸引了不少與他有相同關懷的讀者。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由於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

集——慶祝安志敏八十壽辰》（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2004），頁12-20。陳星燦的《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因為是「偏重在中國文化起源的研究方面」（頁18），以及「側重研究史前考古學者探索中國文化的心路歷程，因此之故，在研究的範圍方面著重於新石器時代」（頁27，註62），所以對於國際學者在中國研究部份，以安特生與仰韶文化之發現的部份分析較多，對於其他考古發現則著墨較少。

[19]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先參考 Roy Chapman Andrews and Henry Fairfield Osborn, *On the Trail of Ancient Man: A Narrative of the Field Work of the Central Asiatic Expedition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26); Roy Chapman Andrews, *The New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 A Narrative of the Explorations of the Central Asiatic Expeditions in Mongolia and China, 1921-1930* (New York: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32).

[20] 這部份是筆者正在持續進行的研究。

[21] 例如，王秀谷等，《德日進與人類的遠景》（臺北：現代學苑月刊社，1969）；德日進著，李弘祺譯，《人的現象》（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傅佩榮，《自然的魅力：盧梭、席勒、柏格森、德日進》（臺北：洪建全基金會，1995）；王海燕編，《德日進集》（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

[22] 例如期刊《第四紀研究》於二〇〇三年七月出版之紀念專號。

[23] 亦有提供資料錯誤者，如楊新質，〈記地質學家德日進〉，《地球》1984.6。

議 (1962-1965) 的革新影響，他的科學神學更是引起一股熱烈的討論風潮。[24] 他散見各處的文章，以及從世界各地寄予親友的信件，也在親友及德日進基金會整理後陸續出版。[25] 但是大多數的研究仍偏向其神學方面的討論，對於他自然科學方面的論著，可能因爲多數爲外國地區田野報告，又可能因爲這些研究成果極易被後來推陳出新的研究成果所擴充或掩蓋，所以較少成爲研究主題。二〇〇四年出版的這份書信集，可以說爲這個部份的研究提供相當珍貴的原始資料。從既有研究狀況可大略看出，現有的德日進研究主要分爲神學與自然科學兩部份，而且兩部份的研究相當獨立，未必有交集。這個現象從德日進生前的作爲即可見到端倪。事實上，在面對其科學領域的對話者，以及其科學書寫時，德日進所遵守的是當時科學界的規範，所以不會牽扯到宗教問題。尤其在工作伙伴並非教徒的情況下，德日進似乎也不會主動提到宗教問題，這點在曾經與他一起工作的外國同儕的回憶中可以得到證實。[26] 這也是爲什麼在他與老師步勒的通信中，我們看不到任何有關其信仰或神學上的討論字眼。事實上，若我們進一步將眼光擴大到同時代法國其他投入史前研究的神父這個群體，[27] 而不是只聚焦在德日進身上，我們更會發現德日進並非特例。大部份這些神父的科學性著作裏也沒有任何宗教字眼，例如與德日進亦師亦友的步日耶就是一例。[28] 有關這些神父—史前史家

[24] 研究當代法國史的歷史學家 Michel Winock 將「德日進熱」列為一九六〇年代重要的法國社會現象之一；見 Michel Winock, *Chronique des années soixant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7), pp. 51, 74-75.

[25] 德日進基金會本身成立於一九六二年，目前總部設在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的總圖書館裏。除了前所提及的數冊書信集之外，有關德日進學術作品結集，可參考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L'œuvre scientifique*, ed. Nicole and Karl Smitz-Moormann, 11 vols. (Olten; Freiburg im Breisgau: Walter Verlag, 1971).

[26] 見 George B. Barbour, *In the field with Teilhard de Chardin*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65)；楊鍾健，《楊鍾健回憶錄》（北京：地質出版社，1983）。由於巴爾博 (George B. Barbour) 本身是新教徒，他與德日進在田野考察時，晚上紮營入睡前，彼此偶爾會談到信仰的問題，但是他很少見到德日進與非教徒的工作伙伴談這些問題。至於楊鍾健則認為德日進完全不像一般印象中的傳教士。

[27] 當時與中國地區考古有關的部份，就有桑志華、步日耶 (Henri Breuil, 1877-1961)、羅學賓 (Pierre Leroy, 1900-1992), 湯道平 (Maurice Trassaert), Jacques Roi 等神父。以歐洲地區史前考古為重心，並且與德日進有來往的還有 Hugo Obermaier, Amédée Bouyssonie, Jean Bouyssonie, Louis Bardon 等神父。

[28] 見 Arnaud Hurel, "Un prêtre, un savant dans la marche vers l'institutionnalisation de la préhistoire. L'Abbé Henri Breuil (1877-1961)," *La Revue pour l'histoire du CNRS* 8 (2003): 4-15.

(prêtres-préhistoriens) 的整體研究當然不在本文可以處理的範圍內，但是把德日進放回這個脈絡裏，我們隱約可看出，相較於其他同樣從事考古等科學活動，卻未留下神學作品的神父們，德日進的特殊性在於他將古生物學方面的觀察抽象化而引入其神學論述裏，但也由於其身後名聲主要是建立在其神學作品上，相對地讓後人忘記他生前其實是以古生物與地質學方面的研究受人重視。另一方面，相對於同時期其他神學著作，德日進神學思想的科學元素以及他的新創名詞例如精神圈 (Noosphère) 等等，又使得他的神學作品比起其他神學作品更新穎、更引人注意。反倒是作爲其神學思想基礎的科學觀察，因爲是屬於技術性的報告和分析文字，在專門讀者群之外反而極少被閱讀和傳播。綜合以上所述，再對照本論文所分析的這份書信集，正可凸顯出：在從事科學活動時，德日進所依循的專業規範和所受到的專業要求，與其他科學家其實是一樣的，而不因其神父身分有所不同。這也是爲什麼在討論其科學研究時，未必需要一併討論其神學思想，反之亦然，因爲德日進在書寫這兩個不同領域的作品時，所針對的讀者群原本就是不同的。

事實上，在現代考古學於中國仍未發達的狀況下，[29] 加上黃土地質的複雜性，中國考古的確是一個既充滿希望，又深具挑戰性的領域。因爲在考古資訊空白的地區，留下第一發現者的紀錄是很有希望的，這也是爲什麼德日進和其他歐洲的考古學家一樣，想來實地試試身手。但這同時也意味著，任何好不容易得到的初步結論，很可能禁不起後繼者小型十字鎬再挖出的結果，很快就會被推翻了 (ces vues sont à la merci d'un coup de pioche)，[30] 如同德日進在一封信中所抒發的考古人心情。爲了瞭解這位歐洲學者抱著短期工作的想法到了中國田野後，因爲長期居留後所產生的心靈與智識上的變化，本文將書信集跨越的年代分成兩個時期來討論。第一個時期大約是一九二三至二七年，這是一個由法國科研機構外派的階段，主要的工作內容是隨同桑志華在黃河、白河流域進行踏查發掘工作，並且整理和研究之前收集的化石。第二時期是一九二八至四〇年，這段時期的德日

[29] 在參考眾多前人著作後，陳星燦將一九二〇年代訂為中國史前考古學的誕生期；見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頁21。根據裴文中的說法，史前學在中國列入大學課程內，是在民國二十九年，從燕京大學開始；裴文中，《中國史前時期之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頁2；後收入《民國叢書‧第三編》（上海：上海書店，1991），歷史‧地理類，第78冊。

[30] 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信，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231.

進正式成為周口店考古計畫的一員，也是他因情勢所趨而進入中國當地學術社群，並且逐漸成為國際級亞洲考古專家的時期。在論文章節安排上，以下第二節將對於德日進本人，以及促成他來華的兩位主要人物——桑志華、步勒——做說明，以幫助讀者瞭解德日進來華背景。第三節和第四節則分別對前述的兩個時期涉及的心理與工作內涵變化作描述分析。結語部份希望能對這個原本以位於巴黎的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為家的古生物學者，轉變成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最後守護人的過程作一整體分析。[31]

貳・德日進來華背景

如前所述，德日進初期來華並非為了擔任周口店工作顧問，而是被他的老師步勒外派，協助已經在華工作多年的桑志華的化石收集與整理工作。以下分別說明德日進、桑志華、步勒三位主要人物的相關背景，以及考察團的成立。

一・德日進

德日進於一八八一年生於法國中央高地附近，中學時代即進入耶穌會 (Compagnie de Jésus) 主持的學校就讀，並在一八九九年十八歲時，正式成為耶穌會一員。一九〇六到〇八年，他被派到開羅一所耶穌會中學擔任物理課程的教學工作。一九〇九到一二年，他到英國接受神學訓練，並在一九一一年被授予神父聖職。德日進與當時從事廣義人類學研究的學術社群的正式接觸是在一九一二年七月，他到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古生物學研究室，和研究室主任步勒談話開始。那次短暫談話促成德日進後來從事古生物學研究的學術生涯。在他後來的回憶裡，他認為是天意 (Providence) 如此，他沒有別的選擇 (Jamais, je crois, la

---

[31] 因為此書信集收錄範圍止於一九四〇年，本文對於德日進在華的最後一段時期，亦即一九四一至四六年間的活動並未納入分析。由於是戰爭期間，德日進這段時間的學術活動範圍大幅縮小，除了守住新生代研究室之外，主要是集中在挽救桑志華所留下的北疆博物院的收藏，並且與繼任桑志華職位的另一名耶穌會士羅學賓一起創立地質學生物學研究所（Institut de Géobiologie，此處中文譯名乃參照當時該機構出版品上提供的中文名稱），繼續整理和出版工作。有關這時期的活動，可先參看 Cuénot,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pp. 279-286.

Providence n'aura joué aussi serré dans ma vie)。[32] 德日進一決定投入古生物學研究後，步勒立即在博物館的系列收藏中找了一個研究題目給他，也就是步勒本人在十九世紀末參與挖掘的 Quercy 地區磷酸鈣岩層中挖掘到的許多肉食性動物化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日進投筆從戎，一直到戰爭結束，得到榮譽勳章的德日進才回到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的研究室繼續工作，在步勒的指導和督促下，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完成博士研究，題目是：「法國始新世早期哺乳動物及其所在地層」(*Les Mammifères de l'Éocène inférieur français et leurs gisements*)。此時，巴黎天主教學院 (Institut catholique de Paris) 地質學教席出缺，學校負責人希望德日進能夠擔任此課，而德日進爲了能夠符合教師資格，同時又進修自然科學的學士課程，在取得文憑後，正式在巴黎天主教學院擔任地質學教授。[33] 也就是說，在一九二三年到中國田野踏查之前，德日進已經具備古生物學和地質學的專業訓練，並且因爲他的論文題目，而在比利時和北美的同業間小有名氣。但是他的中國之行與他的學術同行並無關係，而是與桑志華在中國的傳教發願有關。

二・桑志華

就在德日進因歐戰從軍的同時，另一名耶穌會士桑志華到達中國傳教，其自訂的使命是希望能進行中國北方黃河、白河流域的地理與考古調查，並且培養中國當地菁英對自然科學的興趣。[34] 桑志華於一九一二年在法國取得動物學博士，一九一四年春到達中國，隸屬於獻縣教區，由獻縣教區和法國北方耶穌會教省爲他提供旅行考察經費及以後的常年經費。獻縣教區並指定天津崇德堂供桑志華使用。此處與教會所屬各地教堂有著密切聯繫，爲桑志華的考察活動提供便利的條件。[35] 從一九一四年七月開始，桑志華對黃河流域展開系統性的踏查活動。[36] 帶

---

[32] Jean Piveteau, *Le Père Teilhard de Chardin, savant* (Paris: Fayard, 1964), p. 6.

[33] 德日進在天主教學院的學生人數並不多，他採取的教學方式較接近巴黎大學的補充課程和實習課，主要是帶學生直接到田野觀察岩層堆積情況；見 Piveteau, *Le Père Teilhard de Chardin, savant*, p. 11.

[34] Hurel and Comentale, "Les premières missions paléontologiques françaises," p. 21.

[35] Claude Cuénot, "Le Révérend Père Émile Licent S.J.,"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indochinoises* 41 (1966): 9-83.

[36] Émile Licent, *Douze années d'exploration dans le nord de la Chine, en Mongolie et au Tibet (1914-1925)* (Tientsin: Musée Hoangho Paiho de Tientsin, 1926), pp. 4-5. 根據桑志華自己

著漢族或蒙族的翻譯和廚子，或徒步，或騎馬，或坐篷車，桑志華的足跡很快就踏遍華北地區。在他一份出版於一九二六年的考察紀錄中提到，從一九一四至二五年，他就歷經了五萬公里的路程，所採集到的化石、礦物和昆蟲標本數以千計。事實上，從一九一六年開始，他就開始與步勒聯絡，並將一部份標本寄到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鑑定保存。在德日進尚未加入他的踏查行程之前，桑志華本人的發掘成果就極爲豐碩，其中最著名的有以下幾項。首先是一九二〇年，在隴東黃土高原發現三趾馬動物群化石。同年年中，在甘肅慶陽北面更新世晚期黃土堆積中又陸續發現三件人工打製的石製品，分別是一件石英石核和兩件石英石片。經鑑定後，被認爲是在中國土地上發現的第一批層位清楚的舊石器。這個發現據說也修正了當時認爲「中國無舊石器時代人類」的假設，並且進一步刺激了人們在中國尋找早期人類化石的想法。[37] 桑志華這次的發現，似乎也打響了他自己的知名度，當時關心中國考古的人士開始注意這位法國神父的工作。胡適在一九二八年一篇談文字材料之不足的文章中，就提到他的發現：

> 河南發現了一地的龜甲獸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歷史建立在實物的基礎之上。一個瑞典學者安特森 (J. G. Anderson) 發現了幾處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千年。一個法國教士桑德華 (Père Licent) 發現了一些舊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千年。北京地質調查所的學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發現了一個人齒，經了一個解剖學專家步達生 (Davidson Black) 的考定，認為遠古的原人，這又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萬年。向來學者所認為紙上的學問，如今都要跳在故紙堆外去研究了。[38]

一九二二年，根據一名蒙族當地人所提供的線索，桑志華在鄂爾多斯高原東南角有了更重要的發現。這個薩拉烏蘇遺址（今內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烏審旗境內），[39] 也就是後來所稱的河套人遺址之發現，促使桑志華在同年寫信給步勒，

的說法，這些踏查的行程都是依照「事先研究好的計畫」(programme étudié d'avance) 進行的。

37 賈蘭坡、黃慰文，《周口店發掘記》，頁20。

38 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後收入《民國叢書・第一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綜合類，第95冊，頁204。此處引文中之人名寫法乃照胡適原文抄錄，而未將之改正。

39 賈蘭坡、黃慰文，《周口店發掘記》，頁20。

請求派一名古生物學專家前來支援，步勒因此才派出甫取得博士學位的得意門生德日進到中國。[40]

三・步勒

在二十世紀初的法國古生物學界，步勒可說是最具影響力的教授。這一方面是由於其個人學術成就，很早即受到肯定；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他在該領域建制化的貢獻。步勒原本修習地質學，後來受到其啓蒙老師 Albert Gaudry 影響，轉而研究古生物學，並且把這兩方面的訓練應用到人類化石的研究上，因而成爲法國古人類學（paléontologie humaine，或譯：人類古生物學）領域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領導者。在他個人的學術成就方面，步勒在一八八八年就已提出第四紀地質年代的分期，以及這個時期在古生物和考古學意義方面的對應關係。[41] 另一方面，他對於一九〇八年在 la Chapelle aux Saints 地點發掘出的人類化石 (l'Homme de la Chapelle aux Saints) 之研究，爲當時學界對於尼安德塔人的研究奠定典範式的基礎。[42] 除此之外，他在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化石人類》(*Les Hommes fossiles*) 一書，也奠定了他在世界古人類學領域的地位。該書出版後，立即成爲該領域研究的標準參考書之一。[43] 德日進在這份書信集蒐羅的信中，經常轉達他在中國遇到的他國學者之詢問，關切此書再版進度。[44] 日本人類學先驅鳥居龍藏 (1870-1953) 在其絕筆之作〈考古學的回顧〉一文中，也說明當年寫作《人類與人種》一書時，其寫作大綱是參考步勒的這部作品。[45] 該書之影響力可見一斑。

---

[40] 德日進在未到中國前，便與桑志華有零星書信往來，並且曾經表達自己希望到中國田野的意願；見 Cuénot, "Le Révérend Père Émile Licent S.J.," p. 28。但最後能夠成行，還是因為有步勒的支持。

[41] Marcellin Boule, *Les Hommes fossiles: éléments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 (Paris: Masson, 1921), p. 46.

[42] Henri Vallois, "Marcellin Boule," *L'Anthropologie* 50 (1941-1946): 203-210.

[43] 此書出版後兩年內即銷售一空，並且有多種翻譯本。一九二三年第二版問世後，情況亦同。隨著考古成果不斷出現，步勒決定出增訂版，也就是第三版，卻因為其他工作而耽擱，一直到他過世後，才由學生 Henri Vallois 幫忙編定，於一九四六年出版。Vallois 並且在一九五二年又推出第四版，也是該書最後一版。

[44] 例如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p. 199, 207.

[45] 見中薗英助著，楊南郡譯，《鳥居龍藏：縱橫台灣與東亞的人類學先驅》（臺中：晨星出版社，1998），頁494。但該書引文中將 Marcellin Boule 誤植為 Pierre Boule，不知是

至於在學科建制化方面的貢獻，由於步勒直接師承法國第一代史前考古學發掘者和倡導者 Jean-Baptiste Rames, Louis Lartet, Émile Cartailhac 等人，很早即進入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工作，最後更是擔任自然史博物館的古生物學教席長達三十四年 (1902-1936) 之久，對於該領域的人才培養不遺餘力。法國二十世紀上半期在古生物學及古人類學方面的許多知名學者，包括德日進，以及 Jean Piveteau, Raymond Vaufrey, Henri Vallois 等人，幾乎都與他有師生關係。他在古人類學建制化過程中還有一項重要的貢獻，就是與步日耶神父一起促成古人類學中心 (Institut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46] 的成立，並且擔任第一任中心主任長達三十二年 (1910-1942) 之久。在此之前，對此領域研究的愛好者多是兼職，以其他科別專長在不同機構服務。該中心成立以後，他們開始可以從事長期而專門的研究。法國當時大部份古生物和古人類學方面的學者，都倚賴這兩個機構的設備和資源進行研究和交流。

另外，步勒在法國當時廣義人類學的重要性還表現在他所主持的三種刊物。一是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古生物學研究室的期刊 *Annales de Paléontologie*；一是古人類學中心的刊物 *Archives de l'Institut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第三份刊物，則是當時國際廣義人類學領域最重要的刊物 *L'Anthropologie*。步勒和同事 René Verneau 在一八九四年從創刊元老那邊接手後，一直主持到一九三〇年才將編輯任務交棒給自己的弟子 Raymond Vaufrey 和 Henri Vallois。[47] 德日進在中國田野考古的成果報告，只要是法文發表的，大多是刊登在這些刊物上。

鳥居龍藏本人或是傳記作者中薗英助的筆誤？通曉法語的鳥居龍藏對於法國的人類學活動頗為熟悉，他並且參加成立於一九二〇年，本部設在巴黎的國際人類學學會 (Institut international d'anthropologie)，成為該學會的日本代表。有關這個企圖振興法國體質人類學昔日光榮的學會，目前並無專文研究，有興趣的讀者可先參考戴麗娟，〈二十世紀初法國體質人類學處境：以國際人類學學會為研究對象〉，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 93-2411-H-001-061，2005。

[46] 位於巴黎的古人類學中心，由摩納哥親王阿爾伯特一世 (Prince Albert I^{er} de Monaco) 出資，一九一〇年創立，專門從事史前人類之研究。有關該中心成立之詳細經過，可參考 Arnaud Hurel, "La Création de l'Institut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 par le Prince Albert I^{er} de Monaco: une étape vers l'institutionnalisation de la préhistoire," *Bulletin du Musée d'Anthropologie préhistorique de Monaco* 41 (2000-2001): 49-62.

[47] *L'Anthropologie* 這份刊物創於一八九〇年，其實是由原先存在的三份刊物合併而成的，亦即 Émile Cartailhac 主編的 *Matériaux pour l'histoire naturelle et primitive de l'homme*, Ernest-Théodore Hamy 主編的 *Revue d'ethnographie*，以及 Paul Topinard 主編的 *Revue*

四・法國古生物考察團

爲了善加利用桑志華在中國累積的挖掘成果，步勒派遣德日進前往援助。德日進這個赴華任務名爲「古生物調查任務」(Mission paléontologique)，名義上有德日進和桑志華兩位成員，其實僅有德日進一人是依賴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和其他法國科學研究機構的補助。桑志華則仍是在教會系統內運作，由教會提供經濟支援。由於當時在中國疆域做考古調查的尚有美國的中亞考察團，以及瑞典、日、俄等國的考古專家之零星行動，法國兩位耶穌會神父所組成的這支小型考察隊也被掛上國別，一般稱之爲「法國古生物考察團」(Mission paléontologique française)。[48]

依照德日進在信中提供的收支表，[49] 該考察團在出發前即取得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補助一萬法郎，以及教育部 (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專門補助田野調查的部門補助一萬法郎。一九二三年底、二四年初，因爲計畫延長，又分別取得自然史博物館補助的五千、科學院 (Académie des sciences) Loutreuil 基金會補助一萬，以及古人類學中心的一萬法郎，總共四萬五千法郎。但是因爲政局動盪，法郎匯兌遭遇到大幅貶値的情況，一九二四年間，自然史博物館又撥出一萬，教育部四千，科學院 Loutreuil 基金會再補助一萬法郎來支援德日進在華考古調查。因此最後總額是當時的六萬九千法郎，折合今日將近六萬歐元。[50] 比起同時期其他國家在中國的考察行動，例如美國紐約自然史博物館派遣的中亞考察團所動用的人力和財力資源，法國隊伍可說是人單力薄。若以收穫相比，美國中亞考察團在所得化石數量上也許驚人，但是法國隊伍由於採取在地長期經營的方式，包括興建博物館以及參與當地團隊工作，對於中國史前考古的貢獻其實並不遜色（詳後）。

---

d'anthropologie。創刊以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L'Anthropologie* 都是國際人類學界人士必定閱讀的一份重要刊物。今日雖然繼續發行，但其重要性已大不如前。

48 桑志華後來因為此考察團領隊的掛名，以及成果發表時感到未受尊重等問題，與步勒產生齟齬，雙方合作關係因此生變，兩人在一九二九年正式決裂，而德日進也受到池魚之殃；見 Cuénot, "Le Révérend Père Émile Licent S.J.," pp. 42-45.

49 附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信中；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100.

50 Hurel and Comentale, "Les premières missions paléontologiques françaises," p. 26.

叁・一九二三至二七：法國古生物考察團時期

在這段期間，德日進實際在中國的日期其實只有一九二三年五月到二四年九月，以及一九二六年六月到二七年八月。其工作主要是協助桑志華，一方面整理桑志華過去挖掘的成果，一方面到新的地點探勘試掘。他們先在鄂爾多斯沙漠南沿的薩拉烏蘇河 (Sjara Osso Gol) 流域發現大量的動物化石和石製品，另外還有一枚人類牙齒。後來又在現今寧夏靈武水洞溝發現大批動物化石、石製品及燒骨的遺跡。另外，他們也在陝西榆林地區和鄂爾多斯高原北方萬巴拉寺三聖宮 (St. Jacques) 發現舊石器遺址。關於薩拉烏蘇和水洞溝的挖掘成果，大部份經過德日進初步整理挑選後，都運往巴黎的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研究。在研究工作的分配上，除了古人類牙齒委託步達生研究之外，動物化石由德日進和步勒一起研究，石製品部份則由法國史前考古專家，也是古人類學中心的共同主持人步日耶神父來研究。這些研究成果最後更集合成爲專書《中國舊石器時代》(*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由桑志華、德日進，以及參與鑑定工作的步日耶與步勒四人聯合掛名，在一九二八年由古人類學中心出版。[51]

除了舊石器時代的化石之外，桑志華和德日進其實在旅途中，包括內蒙古、河北、遼寧、熱河等地，發現許多新石器時代的遺物。但是由於當時考察重點在第四紀早期更新世的地層和化石，所以這些發現的整理要等到一九三二年，才由桑志華以他所創建的北疆博物院名義出版。[52]

從一九二三年五月到二四年九月這十七個月內，德日進總共給老師步勒寄了三十四封信，[53] 通信的密度相當高，也是他在中國二十多年中，與步勒通信最多的一段時間。信中除了報告工作進度和探勘結果，也可以看出德日進對自己任務的認知，對巴黎研究室的責任，以及感受到其他國家在中國考古領域的投入。

---

[51] Marcellin Boule, Henri Breuil, Émile Licent and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 *Archives de l'Institut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 Mémoire 4 (Paris: Masson, 1928).

[52] Émile Licent, *Les Collections néolithiques du Musée Hoang ho Pai ho de Tien Tsin* (Tientsin: Mission de Sien hsien, 1932).

[53] 見附錄一的統計表。

一・以自然史博物館古生物學研究室為家

德日進到達中國後，直接以桑志華在天津所建立的北疆博物院爲根據地，兩人很快就展開實地踏查行程。當時北疆博物院的主樓已經大致完成，[54] 他們二人與助手實際上有一個在當地就可以系統地整理標本的工作空間。但是，從德日進這段時間寫給步勒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所認知的研究中心仍是巴黎的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古生物學研究室，也就是他自己以往工作的主要地點。他在信中常常以「家」稱之，每每在信末要步勒代替他向家中的同伴們問好。

相形之下，北疆博物院像是他在田野行程的一個臨時落腳處，主要是整理標本的地方，而不是他真正的研究工作地點。這個以巴黎爲中心的態度不僅是情感上的，也是智識上的。德日進把自己看做是步勒的中國代表，有責任要將田野觀察結果和當地發生的考古相關事物一一報告。這段期間，信的開頭經常是這樣的：

> 這回我是在薩拉烏蘇河畔寫信給您，也就是三月桑志華打電報給我時提到無法前往的那個地方。在中國事情變化很快。我們在這裡已經停留十多天了，而我自己也開始對這個地方有足夠的概念了，才能開始向您報告。[55]

在這段期間，對於在中國當地工作的其他外國學者，以及中國學者，德日進似乎並不積極尋求接觸，只是保持一個基本友好關係。關於中國學者，他在這段期間的信中僅在一開始概略提及地質調查所的丁文江與翁文灝，[56] 並表示與翁氏

---

[54] 有關此博物館的簡介，見 Licent, *Douze années d'exploration dans le nord de la Chine, en Mongolie et au Tibet (1914-1925)*, pp. 11-16. 中文部份，可參考陳錫欣主編，《天津自然博物館八十週年》（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于樹香，〈近代法國傳教士對我國北方的科學考察與天津北疆博物院〉，《歷史教學》2002.6：35-39，但此篇短文不乏有資料錯誤之處。

[55] 原文是： Je vous écris, cette fois, des bords de ce fameux Chara-Ousso-Gol où Licent me télégraphiait, en mars, qu'il n'y avait pas moyen d'aller. Les choses varient vite, en Chine. Nous sommes campés ici depuis une dizaine de jours, et je commence à me faire des lieux une idée suffisante pour vous en parler. 見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四日信件，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63.

[56] 德日進書信集中提到的中國人名，除了少數幾位政治人物如溥儀、張作霖、蔣介石之外，事實上前後也只有工作上有所接觸的丁文江、翁文灝、李四光、楊鍾健、裴文中、卞美年六位。

在布魯塞爾有一面之緣，留下好印象。[57] 至於其他已經在中國田野展開工作的外國學者中，他提到安特生、葛利普[58] 以及美國紐約自然史博物館考察團主要成員安德魯 (Roy Chapman Andrews, 1884-1960)、葛蘭階 (Walter Granger, 1872-1941)，馬修以及該館館長奧斯朋等人。[59] 對於中國社會其他部份，當時的德日進所知甚少，似乎也並不積極瞭解。例如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信中，德日進向步勒提到自己參加中國學會為瑞典王太子訪華所舉行的歡迎酒會，並且被安排與「一名中國考古學家」以及安特生三人各作一場演講，殊不知該名「中國考古學家」乃梁啓超。事實上，在中國初期給親友的信中，德日進就曾經提到，令他感興趣的是中國山水土地，更甚於中國人民。[60] 這或許也是他後來雖因緣際會長期滯留中國，走遍中國疆域許多地方，並且對中國新生代地質研究做出許多貢獻，卻仍然沒有積極學中文的原因之一。[61]

二・法國優先

由於意識到法國隊伍相對地人單力薄，以及起步稍晚，德日進對於自己的外派任務 (mission) 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在這第一時期的信中，經常出現的想法就是希望在發掘及發表上拿第一 (être les premiers)。這點也可從德日進和桑志華當時發表的文章數量和多樣性看出。事實上，這些文章從一、二頁的報導到數十頁

---

57 也就是在一九二二年八月第十三屆國際地質學會議的場合中，兩人第一次見面。

58 葛利普原為哥倫比亞大學地質系教授，一九二〇年應聘來華後，任地質調查所古生物學主任研究員、古生物學研究室主任，並兼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由於其專長是古生代與中生代無脊椎動物化石的研究，所以早期培養的中國學生也都往這方面發展。至於脊椎動物化石方面，則要等到德日進、楊鍾健等人在周口店的工作開始後，才算有持續的進展；見王仰之，《中國地質調查所史》，頁26。另外，葛利普也是中國地質學會創立會員之一，並長期協助《中國古生物誌》等刊物的編輯工作。細節見夏湘蓉、王根元，《中國地質學會史 (1922-1981)》（北京：地質出版社，1982），頁32。德日進在北京期間與葛利普往來頗為頻繁，是葛利普寓所常客之一。

59 此處提及的幾位美國學者之中文名字在當時並未固定，本文所使用的中文譯名多參照賈蘭坡、黃慰文，《周口店發掘記》一書。

60 Teilhard de Chardin, *Lettres de Voyage (1923-1939)*, pp. 34-35.

61 Cuénot, "Le Révérend Père Émile Licent S.J.," p. 53. 該作者提到桑志華曾經要求德日進多學中文，否則不敢讓他一人去田野調查，以免出意外。

的詳細報告都有，內容深淺不一，[62] 重點似乎不是要每一次都提供完整的調查結果，而是要在發表的時間上搶得先機，顯示法國隊伍是某個遺址最早的發現者和研究者。

他們這種戰戰兢兢的心態並非沒有原因。當時在中國土地上，瑞典與美國學者經營較久，頗有成績。俄國與日本也不遑多讓。桑志華雖然在一九一四年就開始踏查和採集化石的行動，但是比起瑞典和美國考察團之規模，法國所投入的人力和財力都是較單薄的。在瑞典方面，主要有安特生，以及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團隊的合作，另外也有探險家斯文・赫定 (Sven Hedin, 1865-1952) 多次的西域考察行動。安特生以其中國政府礦政顧問的身分行動，在調查上原本就比其他外籍學者更有方便之處。他並且與地質調查所的主事者丁文江、翁文灝等人有密切交往，又積極在瑞典國內募款來支持他本人在中國的調查計畫，可以說在當時許多調查及發表上都是主導者。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安特生本人的考古活動就已經是透過瑞典知名考古學家蒙德留斯 (Oscar Montelius, 1843-1921) 來說服國會，取得國家的財力支持而進行的。之後他的許多考古活動甚至也取得王太子古斯塔夫・阿道夫 (Gustaf Adolf) 本人的贊助。[63] 另外，在地質調查所重要刊物《中國古生物誌》(*Palaeontologia Sinica*) 創刊初期，除了有丁文江、葛利普等人的積極籌劃外，經費方面則是透過安特生，請瑞典三家大印刷廠的經理 Alex Lagrelius，以及瑞典火柴大王 Kreuger 等人捐助。[64] 在周口店的挖掘過程中，安特生也曾請烏普薩拉大學的維曼教授 (Carl Wimam, 1867-1944) 派員來支援，所以先後有在瑞典取得博士的奧地利人師丹斯基 (Otto A. Zdansky, 1894-1988)，以及步林 (Birger Böhlin, 1898-1990) 等人來幫忙。而安特生與師丹斯基於一九二一和二三年在周口店的挖掘結果，也在中、瑞雙方協議後，將八百箱化石運往瑞典維曼主持的研究室清理研究。

安特生在一九二五年返回瑞典後，一九二六年底又有享譽國際的瑞典探險家赫定所帶領的考察團準備在中國西北進行多方面的調查。這個由德國、瑞典、丹麥等國人員組成的考察團，原本由安特生出面與丁文江聯繫，已經與地質調查所

---

[62] 德日進有關中國考古方面的文章，參考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一書所附書目。

[63] Fiskesjö and Chen, *China Before China*, pp. 33-49.

[64] 潘云唐，〈前地質調查所的古生物學家與古生物研究〉，程裕淇、陳夢熊主編，《前地質調查所 (1916-1950) 的歷史回顧》，頁35。

達成合作的協議，卻在臨時組成的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的強烈反對下，又經過數月的談判，才在擴大中方人員參與的情況下，得以成行。[65] 在談判的過程中，赫定曾經徵詢德日進的意見，德日進建議他順從中方輿論的要求，在中方的領導下進行考古工作，赫定也因此對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的意見多所讓步。兩人因此事一度成爲當時北京西方學人圈責難的對象，[66] 但也因此建立某種患難之誼。[67] 由於最後這個長達六年的考察有了豐富成果，兩人當初的妥協也由此得到安慰。德日進在中國學人圈頗受尊重，而少惹怨言，可能也與他在此事中所抱持的態度有關。事實上，從赫定此次的事件，以及稍後紐約自然史博物館中亞考察團的類似遭遇，德日進理解到，外國人若不與中方機構合作，未來將不容易以自己國家名義在中國進行挖掘調查，所以爲了科學的進展，應該妥協。但是他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的信中，也就是睽別中國一年多，第三度到中國後給老師寫的一封信，提到美國中亞考察團當時的遭遇時，表達出一名外籍學者當下的感受，他寫到：「中國人此時正陷於一種嚴重的民族嫉妒危機中」(Les Chinois sont présentemment dans une crise aiguë de jalousie nationale)。[68]

至於美國在中國的田野調查，最有規模的當屬上述紐約自然史博物館所組成的中亞考察團。該考察團從一九二二到三〇年，共進行了七次的考察行程。前四次完全以美國學者自己的計畫進行，後三次則受到一九二八年成立的古物保管委員會的要求，以中美合作的模式進行。[69] 考察團以有中國探險經驗的安德魯爲團

[65] 關於中國學術團體協會介入經過，以及地質調查所最後反被排除在外的情況，可見李學通，〈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組建中的爭議〉，《中國科技史料》25.2 (2004)：95-105。該文並且指出，中國學術團體協會雖爭取到中、瑞合作考察的名義，但是所派中方人員並非田野考察專家，最後採集到之古物標本雖全部留在中國，僅將地質採集品副件一份予瑞方，但瑞典學者在考察後陸續發表了五十多份考察報告，中方卻因經費、學者水平所限，報告數量不多，所採集之標本最後亦散佚各處。另外，感謝陳光祖教授的提醒，筆者才得知赫定考察團所發現的居延漢簡最後是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保存。

[66] 見 Furth, *Ting Wen-chiang*, p. 56.

[67] 見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三日信，Teilhard de Chardin, *Lettres de Voyage (1923-1939)*, p. 121.

[68] 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189.

[69] 該考察活動最後終止之原因，主要是因為從一九二八年開始，甫成立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對其收集之標本進行扣查，並禁止他們繼續考察行動。後經幾番談判，雙方協議日後考察均需以中美考察團名義，並有中國代表參加始得放行。雙方以此模式在內蒙古進行了三次考察活動。一九三〇年，德日進與楊鍾健、裴文中還曾經以中方代表的身分參加他們的考察。對於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這樣的要求，美方其實並不認同，美方對此事

長，得到博物館館長，也是著名古生物學家奧斯朋的全力支持。由於經費十分雄厚，[70] 光是前三次調查所動員的專家學者就有二十多人，尚不包括其他後勤技術人員。[71] 一般認爲，這個考察團對於蒙古地區做有系統的挖掘，所發現古化石地點和層位有五十多處，並且對該地區的新生代地層作出了清楚的劃分。[72] 雖然並未如願以償地發現古人類化石，但是在恐龍化石挖掘和研究上有突破性的進展。[73]

也許正是有感於瑞典與美國的投入和收穫，以及本身的使命感，德日進在一九二七年初得知老師因爲他滯留中國而不悅，不願意再爲他爭取田野工作的經費時，委屈地表示：

> 我在這邊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您的學生身分在做的。也就是說，在大家的眼裏，是代表著巴黎，我要給自然史博物館和古人類學中心一個相當於烏普薩拉和紐約的地位。您看，我的居留，即使是不順利，也不是完全無用的。[74]

面對這種潛在的競爭，[75] 法國兩位神父的態度是不與人爭，儘量開拓新的踏勘地盤。在德日進信中，多次提到應小心不要到別人已經展開工作的地區，甚至流露出自動劃分負責區的傾向，把多國發掘的情況看做是分工與互補。例如，在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的信中，他告訴步勒：「聽說美國人從戈壁帶回好幾噸

的看法，可參考 Henry Fairfield Osborn, "Interruption of Central Asiatic exploration by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Science*, n.s., 70.1813 (1929): 291-294. 至於中方對此事的看法，可參考古物保管委員會編，《古物保管委員會工作彙報》（北平：古物保管委員會，1935），頁21-40。

[70] 除了有博物館本身的經費支援外，其他捐款贊助人士超過兩百人；見 Andrews and Osborn, *On the Trail of Ancient Man*, pp. 361-364 所附的贊助者名單。

[71] 同前書，頁v。

[72] 楊鍾健，〈中國新生代地質及脊椎古生物學之現在基礎〉，《地質論評》（北平）7.6 (1942)：342。

[73] 此考察團的目標原本是要尋找遠古人類的遺跡，但是這方面的成果甚微，倒是在第三紀哺乳動物化石的採集上，數量豐富；見賈蘭坡、黃慰文，《周口店發掘記》，頁21。

[74] 原文是：Et bien, tout cela, je le fait, aux yeux de tous, comme votre élève. C'est-à-dire que, représentant, dans l'opinion publique, Paris, c'est le Muséum et l'I.H.P. auxquels j'arrive à donner une place équivalente à Upsal et New-York. Vous voyez que mon séjour, si malencontreux soit-il, n'est pas inutile. 見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信，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166.

[75] 這種潛在的競爭心態並不只有法國人感受到，安特生對於美國隊伍的設備和人力之豐，似乎也是耿耿於懷；見 Fiskesjö and Chen, *China Before China*, pp. 34-35.

的化石。我想可能是白堊紀的東西。我們兩邊正好互補，這也是件好事。」[76]

其實，法國兩位神父所組成的這個考察團雖然人單力薄，他們的收穫和最終貢獻並不算少。最主要是因爲桑志華十分善用在中國當地的天主教傳教網絡，在德日進還未加入之前，就建立起一個頗有效率的教會考古情報系統，這使得法國考察團時而有意想不到的收穫。例如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四日的信中，德日進向老師報告他們出發前的準備工作和預備挖掘的遺址地點，難掩得意之情地寫到：「這都得感謝比利時神父們給我們這些連中國地質調查所都不知道的『小道消息』。」(C'est grâce aux missionnaires belges que nous avons tous ces "tuyaux," inconnus du service géologique de Chine)[77] 從此處也可看出，他們雖不與人爭，但在尚未前往計畫中要探勘的地方時，也懂得儘量保密，以免遭到無端攔阻，或被別的隊伍捷足先登。[78]

在德日進這段時間的書信中所流露出法國優先的想法，除了在探勘上要取得優先外，還包括研究成果發表之處。德日進曾經向步勒強調他會以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的刊物或同類的法國刊物爲優先，較晚再給也積極邀稿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刊物。[79] 事實上，德日進這個時期較完整的幾篇研究報告都刊登在步勒主持或法國地質學會的刊物。

儘管有這些工作上的潛在競爭，德日進還是對於當時在中國工作的部份學者們對科學的熱愛和某種超越國族的情誼抱著希望。在赫定與古物保管委員會談判期間，德日進給經常與之通信的遠房堂姐 Marguerite Teillard-Chambon 的一封信中，他提到在北京的某次聚會：

> 我經常向妳談到北京聚會中的真誠氣氛。這次總共有十多個朋友出席，差不多都是親密無間的朋友。四位中國人：丁先生、地質調查所所長翁先生、大學教授李先生，還有博物愛好者金先生。幾位是美國人：我的好朋友古生物學家葛利普博士、美國醫科大學的步達生博士，以及美國考察團的古生物學家葛蘭階。兩位瑞典人：安特生和斯文・赫定，加上我自己。

---

[76]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77.

[77] 同前書，頁65。相關地質年代表，可參考附錄二。

[78] 德日進在抵華後第一封信中就提到桑志華給他的忠告，亦即，在未出發進行實際調查前，儘量不要與地質調查所提及考察的路線；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50.

[79]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信；同前書，頁91。

像往常一樣，我們多少都感覺到是在超越國族、種族，甚至「宗教信仰」的藩籬，以人為基礎的情況下相聚。但是這一天，在這個多起出發行程前夕的聚會，在這個充滿激情和仇恨的遠東氛圍中，是有些悲愴感覺在我們之間流過。桌上佈滿了蘋果樹的鮮花，那是春天也是暴風雨的象徵，我們每個人輪流發言，談到了友誼、合作和多少有些宏偉的希望。[80]

但是德日進這種與人爲善的態度，在當時中國那種民族主義高張的氣氛中，還是可能遭人曲解。一九二九年後與他有頗多合作關係的中國學者楊鍾健在其回憶錄中提到：

德日進雖為天主教徒，而交遊卻甚廣泛，三教九流均有他的朋友，幾乎我等所痛恨之外國人，他均與之保持接觸。我們戲之曰「國際間諜」。[81]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派在中國工作的德日進，雖有以法國優先的想法，但是在田野現實中不同力量拉扯的情況下，處境經常是左右爲難的。而這應該是在巴黎只關心發掘成果的步勒所無法想像的田野情境。

三・歐洲參考

在德日進到達中國之時，史前學在歐洲已經累積半個世紀以上的研究經驗。受過完整古生物學和地質學訓練的德日進來到史前研究才正要起步的中國地區，

---

[80] 原文是：Je t'ai souvent vanté la cordialité de ces réunions pékinoises. Nous étions là une dizaine d'amis, presque d'intimes. Quatre Chinois: Ting, Wong, directeur du Survey. Lee, professeur de l'Université, King, gentilhomme naturaliste, plusieurs Américains: le D^{r} Grabau, mon grand ami le paléontologue, le D^{r} Black, de l'Université de médecine américaine, Granger, le paléontologue de l'expédition américaine. Deux Suédois: Andersson, Sven Hedin et moi. Comme d'habitude, il y avait sur nous le triomphe plus ou moins distinctement perçu de se rencontrer sur le palier humain, entre hommes, au-dessus de toutes barrières nationales, raciales et même «confessionnelles». Mais ce jour-là, dans cette réunion qui précédait beaucoup de départs, dans cette atmosphère d'Extrême-Orient, si chargée de passions et de haines, il a certainement passé à travers nous quelque chose de pathétique. La table était jonchée de fleurs de pommiers, signe de printemps et de tempêtes. On a parlé chacun à son tour d'amitié, de collaboration, d'espoirs plus ou moins vastes. 見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信，Teilhard de Chardin, *Lettres de Voyage (1923-1939)*, p. 103. Marguerite Teillard-Chambon，筆名 Claude Aragonnès，是第一位在德日進過世後積極整理並出版其書信的作者。有關步達生的部份，此處為符合原文而譯為美國醫科大學，實即為協和醫學院。

[81] 楊鍾健，《楊鍾健回憶錄》，頁81。

很有自信地認爲自己將可以有重要發現。在他的第二封信 (1923.05.25) 中，就表示：「我想，要在蒙古地區找到至今沒人辨識過的史前人類用爲工具的石英打製品是很有希望的」。[82] 而他在同年九月八日的信中的確提到他們找到的石英岩片，並且向老師做了詳細的描述。[83] 可見他對自己在茫茫田野中辨識遺址的能力是有信心的，也對自己在這個相對而言還沒有太多考古成績出土的地區工作之結果充滿希望。

不過，對於找到史前遺物後所要進行的鑑定和詮釋工作，德日進就沒有那麼肯定了。事實上，他的知識工具來自於他在歐洲所受的訓練，大部份是有關歐洲地質第四紀的知識，要以這個知識系統去標定中國華北地區挖掘出來的古生物以及地質年代，並非那麼理所當然。他在歐洲工作所習慣採取的是生物地層定位法，也就是以同一地點挖出的動物群化石來判斷其演化的階段，並進一步推斷地質年代，所以當某個遺址所挖掘到的動物化石太零碎或太少，他就會感到束手無策。例如在寧夏的挖掘就遭遇到這類鑑定上的困難。德日進尤其擅長以嚙齒目動物 (Rongeurs) 作爲指標，從而斷定遺址的年代。所以在中國田野他也維持這個習慣，以這類動物遺骸爲優先尋找和處理的對象。例如在到達天津初期，尙未出發前往田野，德日進先著手整理桑志華先前累積的挖掘成果，就認爲：「嚙齒目動物可能是有助於分辨中國與蒙古中新世以後地層的最佳化石之一」(les Rongeurs sont un des meilleurs fossiles permettant de classer les terrains post-miocènes en Chine et Mongolie)。[84] 而在指標化石缺乏的狀態下，他只好以其他方式去粗估出土化石的年代。

由於鑑定工作亟需動物化石與現生動物骨骼的系列收藏來做比對，德日進在信中偶爾會感嘆他的鑑定工作曠日廢時，就是因爲在當地缺乏比對的系列收藏。例如，一九二三年冬，田野工作結束後，回到博物館室內工作的時期，德日進告訴老師：「在缺乏許多書籍和比對標本的情況下，我盡力整理我的嚙齒目動物，但是只能慢慢進行」(Je travaille tout doucement mes Rongeurs, autant que je puis le faire sans beaucoup de livres ni de pièces de comparaison)。[85] 在這種情況下，他必須時常依賴巴黎的老師或同事幫忙鑑定標本。例如在一九二三年六月整理一批動

---

[82]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50.

[83] 同前書，頁73。

[84] 一九二三年六月七日信；同前書，頁52。

[85]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九日信；同前書，頁89。

物化石標本時，他曾提到一個形態與一般牛角略有不同的牛角標本。在同年十月底的信裏，他描述先前處理的牛角，不是一般牛隻 (bœuf)，而應該是水牛 (buffle) 的角，但他懷疑水牛角的根部切面是否有可能是三角形的？因此請老師幫他查證。[86] 鑑定後的這個水牛的學名就叫做王氏水牛，以當時指引桑志華挖掘的蒙人王氏為名，而步勒與德日進則聯合掛名為第一個確立該物種的研究者：*Bubalus wansjocki* Boule and Teilhard。[87] 在德日進這段時期的另一項重要研究，也就是泥河灣動物群化石的研究成果中，[88] 亦可見到許多德日進和其同事 Jean Piveteau 合作鑑定的化石物種。[89]

事實上，不只是德日進在鑑定時必須倚賴西方學者與收藏，當時丁文江、安特生在鑑定上也遭遇到一樣的問題。因為當時中國缺乏專業的古生物學家，也缺乏比對標本，屬於這個領域的化石鑑定工作，丁文江只能求助於美國專家或受他之邀，於一九二〇年開始到中國教書的葛利普。[90] 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給胡適的一封信中，丁文江談到他從廣西北歸後的工作問題，他表示：

> 如可以安安穩穩住在北京，而且地質調查所這個機關依然存在，可以利用，我或者可以專心研究幾年。否則沒有法子的了。你要知道，我的研究，非有相當的設備，和相當的技術人員幫忙，是不能做的。要是離開了圖書館和試驗室，再沒有葛利普同他的學生來幫我鑑定化石，繪圖員給我繪圖，我絕對無法子可以著手。[91]

其實丁文江之所以邀請葛利普來華任教的原因，也是因為當時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的學生基本條件太差，無法勝任地質調查所工作之故。胡適在《丁文江的傳記》中提到，一九一六年後，原來由丁文江主持的地質研究所由北京大學收

---

86 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82.

87 見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Pierre Leroy, *Chinese Fossil Mammals: A Complete Bibliography Analysed, Tabulated, Annotated and Indexed* (Pékin: Institut de Géobiologie, 1942), p. 83.

88 泥河灣是河北省西北部桑干河畔一村名。

89 兩人合作的成果主要發表在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Jean Piveteau, "Les mammifères fossiles de Nihowan (Chine)," *Annales de Paléontologie* 19.1-4 (1930): 3-134 一文，另可在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Leroy, *Chinese Fossil Mammals* 一書中查到化石種類清單。

90 見丁文江著，黃汲清、潘云唐、謝廣連編，《丁文江選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其中黃汲清序，頁2。

91 胡適編，《丁文江的傳記》（臺北：胡適紀念館，1973增訂版），頁73。

回，重新設立地質學系，等於由北大擔任培養地質人才的工作，地質調查所則吸納該系畢業之人才，專做調查研究的工作。初期畢業學生到地質調查所應徵，由丁文江親自考試，每人發給十種岩石辨認，結果無一人及格。[92] 丁文江因此深感人才培養方式需要改善，遂與胡適及蔡元培商量，請李四光與葛利普到北大地質系任教。

除了丁文江的例子之外，安特生在其《中國北部之新生界》一書前言中，也提到紐約自然史博物館中亞考察團的葛蘭階，和原本在瑞典工作的師丹斯基在古生物化石鑑定方面的幫忙。[93] 事實上，前面已經提過，安特生與師丹斯基在一九二一和二三年於周口店挖出的第一批化石，也大多送往烏普薩拉大學維曼研究室去清理研究。

由於這樣的問題常常出現，德日進希望桑志華能夠儘早在北疆博物院內完成這樣的參考系列收藏。而在這樣的理想沒有實現之前，許多出土的東西經過初步分類後，必須送到巴黎做進一步鑑定。這種現實的工作需求，與原本就應該要寄回任務成果的情況，有時是並行的，有時卻因爲有運送成本和時間的考量，而有必須決定優先順序的困難。信中也因此可見德日進問步勒：您認爲要整批運送，還是只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94] 有時，德日進表示，因爲擔心稀有標本寄丟，決定等自己回法國時才一起帶。[95]

四・田野現實

由於懷抱著一些在歐洲就訂定的目標，德日進在面對田野實況時也會產生困擾和挫折感，而不免感嘆現實和理想目標的差距。例如在層位鑑定方面，在其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四日的信中，因爲無法判斷自己所挖掘到的石英岩質石片器和歐洲同類石器對應的年代，他感嘆到：「中國真是一個層位辨識嚴重殘缺的國家」(La Chine paraît vraiment un pays à grandes lacunes stratigraphiques)。[96] 或像是在

---

[92] 胡適編，《丁文江的傳記》(1973)，頁16。

[93] Johan Gunnar Andersson, "Essays on the Cenozoic of Northern China,"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地質專報, ser. A, 3 (Peking, 1923), p. 3.

[94]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四日信；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94.

[95]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九日信；同前書，頁89。

[96]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四日信；同前書，頁94。

一次接近戈壁之旅，他提到，「這地方在地形、地質方面是混亂一片」(le pays est typographiquement et géologiquement chaotique)。[97]

另外，德日進在信中也偶爾表現出對舊石器時代的偏好，因此對較常出現的新石器時代器物感到無奈。由於人類起源問題是當時歐洲學者主要關切的研究，使得德日進在田野初期一直期望能找到舊石器時代的人類活動遺跡，也就是發掘「黃土形成之前的人類」(l'homme d'avant le lœss)。也因爲這個念頭，所以儘管其採掘成果並不算少，德日進在初期還是不免流露失望的情緒，而發出「還是沒有舊石器工業的痕跡」(Pas d'industrie paléolithique encore!...) 這樣的嘆息。[98] 或是像「我們一到大河谷，新石器就出現：總是一樣的型態」(Dès qu'on accède aux larges vallées, le Néolithique apparaît: toujours du même type) 這樣的感慨。[99]

這樣的認知一直到後期才慢慢轉變，德日進並且認清新石器遺跡的豐富正是中國田野的特性。在他一九四四年和裴文中聯名出版，以法文寫成的《中國新石器時代》(*Le Néolithique de la Chine*) 一書中，便顯露出長期在田野浸淫後的心態調整。他們認爲中國田野的精彩之處，是發生在第四紀更新世晚期，人類文明活動於此時留下了有趣的證據。也只有加強研究這個時期，中國田野考古才更可能在國際上佔有一席之地。[100]

綜合來看，在這段時期的書信中，德日進表現出要達成任務目標的內心壓力、智識上的孤獨感，以及對未來去留的不確定感。而差旅經費的使用、延長駐留中國時間與否等等問題，其實佔據了這段時期他與老師通信內容的不少篇幅。

肆・一九二八至四〇：周口店工作時期

一九二六至二七年間，同時發生的幾個事件改變了德日進在中國的命運。首先是他個人與教會關係的改變，造成他暫時無法繼續在巴黎天主教學院任教，只好接受教會的安排，回到中國教區。這起所謂的「德日進事件」源自於德日進在

---

97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信；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173.

98 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信；同前書，頁194。

99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信；同前書，頁173。

100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Pei Wen-Chung, *Le Néolithique de la Chine* (Pékin: Institut de Géobiologie, 1944), p. ix.

一九二〇年代初寫成的一篇討論原罪的文章。這篇已經帶有演化論觀點的文章本來只在少數幾個同好間流傳，卻在一九二五年左右傳入了教廷，引起教宗的不滿，決定革除他在巴黎天主教學院的教職。最後在多位資深神職人員從中緩頰的結果，教會以繼續讓他外派中國教區來掩飾教廷對他懲戒所造成的難堪。[101]

一九二六年六月，德日進因此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再次來到中國，而不是像一九二三年第一次來華，是帶著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交付的考察任務前來。在這樣的情況下，德日進對於自己居留期間的長短並沒有明確的計畫，而是隨著教會的安排行事。在桑志華要求協助的情況下，他此行的任務則是繼續擔任其助手，幫忙整理北疆博物院已有的古生物標本收藏。

這個事件的結果，卻連帶地影響到德日進與老師步勒之間的關係。雖然此次德日進到中國完全是因爲教會的決定，而不是步勒的安排，但是在初期，步勒仍然想辦法以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外派任務的名義，爲他爭取到相關的科學機關的差旅補助，讓他得以在中國居留，繼續田野考察和標本整理的工作。依照步勒個人的規劃，德日進在中國最多再停留一年，就應該結束其田野考古的行程，回到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的研究室來工作。然而，不久之後，步勒似乎理解到，德日進爲了遵守教會帶有懲戒性質的安排，可能會長時間滯留於中國教區，而不是如他預設的那般，在短期之內就可以回到巴黎。步勒無法理解德日進對教會這種不合理的懲罰如此順從的態度，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發出的信中，他因此告知德日進不再爲其爭取旅華經費的決定。[102]

面對步勒的不諒解，德日進雖然感到委屈和無奈，但也只好接受。事實上，他自己當時也瞭解，教廷不可能那麼快撤除對他的懲罰，他若要繼續擔任神職工作，是不可能違抗教廷決定的。所以對於未來幾年的走向，他認爲自己可能必須改變原來回歸巴黎研究團隊的規劃 (il faut donc décidément que je change mon fusil d’épaule)。[103]

---

[101] 事實上，德日進猜測，一些幫他在教宗面前說情的人多少用了以下的理由，而讓他得以到中國繼續在北疆博物院工作，亦即，只要他不再碰觸神學問題，就讓他繼續從事專業的純科學工作 (Au fond, je suppose qu’on désire m’être agréable, et me dériver dans la pure science)；見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日信件，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164.

[102]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信；同前書，頁166。

[103]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日信；同前書，頁164。

儘管如此，一九二七年初的德日進似乎還不能確定自己未來要何去何從。一直到他在一九二九年春天，第三度回到中國後，他與桑志華合作關係因爲桑志華對步勒的不滿而變質，又因爲觀察到周口店豐富的挖掘成果等等原因，終於驅使他答應了步達生等人在一九二七年初就提出的邀請，決定擔任周口店挖掘工作的古生物學顧問。[104]

事實上，在中國田野工作幾年下來，德日進逐漸意識到這塊土地在史前學方面的潛力。雖然在一九二六年，他對於安特生和師丹斯基有關周口店兩枚人齒的大膽宣佈採取保留態度，他卻也認同當時國際史前學界一部份人懷有的想法，亦即，中國土地很有希望能夠挖掘到遠古人類的遺跡，而且可能就是人類的祖先。另一方面，中國史前學界在中外學人如丁文江、翁文灝、安特生、葛利普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在一九二〇年代也展現了充沛的活動力，不僅有地質調查所推動的種種考察發掘工作，中國地質學會在資訊和人才流通方面也十分活躍。[105] 他在信中曾經多次提到中國地質學會年會的活動，[106] 相對於當時政局的動盪，他對中國整體史前學界的努力十分肯定。[107] 就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下，德日進對於留在中國的態度，從消極逐漸地轉爲積極。除了參與地質調查所和中國地質學會的工作之外，他與成立不久的中央研究院似乎也有些許接觸。[108]

一九二九年春，德日進正式成爲地質調查所新成立的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譽顧

---

[104] 德日進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日的信中提到安特生和步達生對他的這項提議；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165.

[105] 有關中國地質學會，可參考夏湘蓉、王根元，《中國地質學會史 (1922-1981)》。根據該書所提供的資料，德日進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第六次常會時，第一次參加該會活動，並做了一次報告，標題為：「甘肅東部和內蒙古新生代脊椎動物化石」。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特別會中，德日進曾經宣佈周口店洞穴最新發掘成果。另外在一九二八年，德日進成為該學會的評議員 (councilor)；同前書，頁60, 70, 230。

[106] 他並且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日給老師的信中提到，中國地質學會的年會是中國地質學界一年中最重要的一次會議；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165.

[107] 儘管當時個人諸事不順，加上中國政局丕變，但是德日進仍然看到中國史前學領域的活力。例如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日的信中，他表示：「無論如何，在北京的地質學界仍然很有活動力」(Malgré tout, le monde géologique demeure très actif à Peking)；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165.

[108] 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傅斯年檔案中，可找到與德日進相關的兩份文件。一份是一九三二年六月，歷史語言研究所聘他為特約研究員的聘書；另一份是一九三九年一月，歷史語言研究所聘他為通信研究員的聘書。可惜該檔案中並沒有其他文獻可以提供更多相關的細節。筆者在此要感謝邢義田教授的提醒，才未忽略這個可能的資料來源。

問 (Honorary adviser)。據他自己對老師的分析，這個職位的好處是沒有約聘關係，也沒有固定任期，只要他在中國的期間能夠儘量將時間貢獻在對周口店出土化石的整理工作上即可。如此，他也可以在需要的時候，繼續幫忙桑志華的工作。[109] 事實上，周口店遺址所蘊藏的史前人類遺跡出人意料之外地豐富，當德日進從步達生研究室看到一九二八年的成果時，他向步勒承認自己難掩的興奮之情，[110] 也更確定自己的投入將可以有所貢獻。從後來發表的質與量看來，德日進在中國的第二時期，將他在第一時期摸索出來的田野經驗與他原來在歐洲的訓練結合起來，於此階段有了充份的發揮。他之前與桑志華一起發現的河套文化與周口店地區的比較研究，尤其有助於瞭解中國舊石器時代的文化期序列。[111]

儘管如此，在決定留在中國長期工作之初，德日進對於自己最後選擇接受步達生等人的邀請，感受仍然是很複雜的。雖然對於田野不斷出土的遺物感到興奮，與當地機構合作也多了物資和工作上的便利，[112] 但他還是不免感到精神上和智識上的孤獨。不止一次，他在信中寫到若能與老師當面討論的好處；雖然他很高興自己是在當地的工作團隊中幾乎唯一的古生物化石專家，所以他從鑑定到詮釋都可以獨立作業，但這也是他惶恐之處，所以他曾數度表示需要法國方面的某種支持。例如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日的信中，他就對步勒表示，亟需法國同行對他的觀察和推論一種品質上的「控管」(Et je voudrais un contrôle)。[113] 隨著愈多的發掘成果出土，德日進與其他外國學者一樣，愈覺得中國土地在考古學方面的潛力，但也愈覺得需要來自巴黎的專業意見。例如一九三二年四月五日的一封信中，德日進寫到：

> 從巴黎寄來的音訊對我來說總是最好的，您知道的，更不用說，在中國，以那些大部份由我所負責的工作為基礎而建立的研究迅速發展，我愈來愈感到有倚賴堅實科學意見的需要。[114]

---

[109] 一九二九年五月八日信；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191.

[110] 一九二九年五月八日信；同前書，頁189。信中他寫到：「現在，我會說這些殘骸十分令我『興奮』」(Maintenant, je vous dirai que ces pièces m'ont vivement "excité")。

[111] 這點從他甫正式加入新生代研究室的一封信 (1929.05.08) 就可看出，信裡他將當時周口店堆積中已初步整理完的哺乳類動物化石和自己在泥河灣所見進行一初步比較研究；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192.

[112] 參照後面與楊鍾健合作一節。

[113]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205.

[114] 原文是：Les nouvelles de Paris sont toujours pour moi les meilleurs, vous savez, - sans compter

成爲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一份子後，德日進的身分已經不是巴黎的科研中心的外派使者。但是他與步勒的通信並沒有中斷，只是通信次數變得稀疏，信件內容也從過去急於報告自身田野工作所得、經費使用情況，或是行程安排等等，轉變成對中國及亞洲地區進行中之考古情況的近身描述和分析。從這個時期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在鑑定工作上對於巴黎的持續依賴，但是另一方面，他也逐漸不再用歐洲考古的文化分期框架來思考中國田野的發掘成果，而是試圖建立一個屬於中國史前文化分期的對應表。除此之外，他在與中國學者的合作，以及中國人才的培養上，也和前一段時期的經驗有所不同。

一・在鑑定工作上對巴黎的依賴

綜合這段時期信件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工作地點在中國，但是在必要時，德日進仍然向在巴黎的師長與同事要求協助。尤其是在鑑定工作上，可以看到法國學者的影響。鑑定工作主要可分三方面：第一是遺址地質年代之鑑定，這方面有一大部份是依賴古生物化石的鑑定；第二是人類化石的鑑定；第三則是和人類文化遺跡有關的研究，包括用火遺跡、石器、骨器方面的鑑定。

（一）地質年代之鑑定

在周口店遺址，地質年代的研究工作是由德日進和楊鍾健一起負責的。在缺乏現在所使用的定年技術和儀器的情況下，當時對地質層位及年代的推定只能依賴生物化石。也就是，在地表部分的地質現象，可以從堆積現象直接觀察，但是對於地底部份，則要從古生物，尤其是從當時挖出的象、犀牛、水牛、馬等豐富的哺乳類動物化石來推定地質年代。德日進和楊鍾健兩人的工作對於遺址的地層序列、年代框架的建立和以古動物群演化爲標誌的古生態環境的還原工作有奠基性的貢獻。尤其德日進因爲有先前在水洞溝、薩拉烏蘇、泥河灣等地點的古生物群歸納研究的經驗，企圖把周口店的動物群化石與當時已知的中國其他地點發掘成果做比較，以逐漸建立對中國地質新生代部份的系統認識。事實上，這樣的工

---

le besoin que j'éprouve davantage de m'appuyer sur un fond d'avis scientifiques solides, - à mesure que les constructions s'élèvent rapidement en Chine sur des fondations dont je suis en bonne partie responsable. 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223.

作需要與已知的標本進行比對，才能逐漸確立其順序。例如在當時發掘出的古生物標本中，偶蹄類動物大多交由楊鍾健整理研究，[115] 但是在其中一種特別的扭角羊 (*Spirocerus*) 的確認上，爲了確定周口店這種扭角羊與德日進先前在泥河灣以及其他地點發現的扭角羊之間的演化關係，德日進特別請在巴黎的同事，也是與他一起完成泥河灣哺乳動物化石之分析的 Jean Piveteau，及老師步勒幫忙判斷。[116] 在後來發表的有關中國猿人的結論報告中，周口店發現的這種扭角羊並且被稱爲裴氏扭角羊 (*Spirocerus peii*)，有別於泥河灣時期的翁氏扭角羊 (*Spirocerus wongi*)，以及後來黃土期的吉氏扭角羊 (*Spirocerus kiakhtensis*)。[117]

（二）人類化石之鑑定

在周口店的人類化石鑑定上，依照當時新生代研究室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協定，是交由協和醫學院解剖系，也就是步達生負責。不過，由於步勒在尼安德塔人研究上享譽國際，步達生也在必要時參考其意見。一九二七年底，步達生在對周口店出土的第三枚牙齒鑑定後，在《中國古生物誌》發表的論文中，將此一新發現的人類化石建立一個新屬和新種：中國猿人北京種，一般俗稱爲中國猿人、北京猿人或北京人。德日進與步勒當時對此決定其實有所保留。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裴文中發現第一個北京猿人頭蓋骨。十二月六日，這個頭蓋骨才被裴文中親自送到北平步達生的研究室。德日進在十二月十一日就已經寫了一封信給步勒，詳細報告頭蓋骨的外型特徵和出土地點的狀況，並且已經將頭蓋骨與已知的

---

115 這部份的研究成果發表在：Young Chung-Chien, "On the Artiodactyle from the Sinanthropus Site at Choukoutien," *Palaeontologia Sinica* 中國古生物誌, ser. C, 8 (Peking, 1932), 2: 1-100.

116 見一九三二年四月五日信，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224.

117 主要成果發表在 Davidson Black,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Young Chung-Chien and Pei Wen-Chung, "Fossil Man in China: the Choukoutien Cave Deposits with a Synopsis of Our Present Knowledge of the Late Cenozoic in China,"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地質專報, ser. A, 11 (Peking, 1933), pp. 1-166. 此綜合報告雖由四人共同掛名，但德日進負責撰寫的部份佔了大約三分之二，亦即第一部份：周口店堆積及新生代地質，和第三部份：中國猿人文化。步達生負責第二部份：中國猿人體質方面的報告。裴、楊二人之貢獻在於發掘與整理研究上。另外，楊鍾健亦在翁文灝的要求下，將此書改編翻譯，另成一獨立中文版報告：楊鍾健，《中國人類化石及新生代地質概論》，收入《地質專報・乙種・第五號》（北平：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國立北平研究院地質學研究所，1933）。此處乃參考楊鍾健此文，頁19。

爪哇直立猿人和尼安德塔人同樣部位的特徵作一概略比較。[118] 在進一步清理過化石後，步達生與德日進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發了一通電報給在巴黎的步勒，當作賀年訊息。[119] 步勒在該年底出版的 *L'Anthropologie* 期刊中報導此事，並且直接載錄德日進和步達生寄給他的一手資料和相片，駁斥十二月中旬英國報紙對此事件的誇張報導，以及導向間接證實已經議論了十七年的皮爾當人之真實性的詮釋。[120] 步勒並且在該文中指出，以步達生提供的北京人頭蓋骨相片與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存有的一八九四年爪哇出土的直立猿人 (*Pithecanthropus erectus*) 頭蓋骨模型相比，其相似處多於相異處。這點看法與步達生最後鑑定的結果吻合。此一結果也等於間接證實了當時還存有爭議的爪哇直立猿人的真確性。因此，步勒在一九二九年這篇報導性的文章中就認爲，以二者的相近程度而言，當初其實不需另立新屬，而只需立新種，也就是爪哇猿人與中國猿人都歸於直立猿人，只是不同種。所以當初的中國猿人屬北京種直接稱爲直立猿人屬北京種 (*Pithecanthropus pekinensis*) 即可，以免形成日後發現的人類化石都直接立新屬的趨勢，會在比對和命名原則上造成衝擊。[121] 事實上，隨著陸續出土的北京人遺骸研究，大部份的體質人類學家也都認爲二者之間同多於異。步達生過世後的繼任研究者魏敦瑞 (Franz Weidenreich) 在一九四三年也承認，二者實在是同一屬，不過他尊重步達生，所以不更改北京人的學名。[122] 於此可見，步勒的看法，在後世其實是獲得支持的。

至於北京猿人在當時已知的靈長類中的排序問題，在那幾年間並無定論。步勒等人的意見是，北京猿人介於類人猿 (Singes anthropomorphes) 與現代人類 (Hominiens) 之間。隨著更多骨頭的發現和比對，最後暫訂的結論是，比起爪哇猿人，北京猿人較接近現代人類，但是比尼安德塔人更古老，因此暫時把他歸屬爲前人類 (Préhominiens)。[123] 他們不是現代人類的直接祖先，頂多是和現代人類

---

[118]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200.

[119] Marcellin Boule, "Le « Sinanthropus »," *L'Anthropologie* 39 (1929): 455-460.

[120] 同前文，頁456。

[121] 在這點意見上，步勒始終堅持不需另立新屬的看法。除了一九二九年的文章外，另可參考 Marcellin Boule, "Le Sinanthrope," *L'Anthropologie* 47 (1937): 1-22.

[122] Franz Weidenreich, "The Skull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Palaeontologia Sinica* 中國古生物誌, ser. D, 10 (Peking, 1943), p. 246.

[123] Boule, "Le Sinanthrope," p. 18.

有共同祖先。[124] 等待未來的更多其他遠古人類化石出現後再來修正這個分類。

不過，在一九三一年後確定同一出土地點有用火及石器製作遺跡後，北京猿人的文明程度與其生理型態上顯現的原始程度無法對應的問題，又一度引起古人類學家（包括步勒）的困惑以及不同的推測。

（三）文化遺跡之鑑定

法國專家對於周口店相關出土化石的鑑定上產生最大影響力的，可能是在北京人文化遺跡的鑑定和詮釋方面，因爲直到一九六〇年代，產生爭論的中國學者雙方仍然延續著一九三〇年代步日耶和德日進的看法。李濟在綜合分析周口店文化的一篇文章裡甚至表示，因爲德日進與步日耶一樣，都是「法國傳統薰陶出來的科學家」，所以後來「對於周口店骨角器文化流傳的兩種不同的解釋及若干爭辯之來源，都可以追溯到歐洲先史學的傳統裡去」。[125]

在一九二九年以前，由於發掘的焦點都集中在尋找人類遺骸的化石，對於代表遠古人類活動遺存的石器、骨器等等並不留意。負責周口店現場指揮挖掘工作的裴文中在德日進的提醒後，開始留意這類化石。[126] 一九三〇年，裴文中從挖出的碎骨化石中，發現疑有燒骨痕跡、灰燼土和石英岩片等，推斷中國猿人有製作石器的可能性。在無法斷定是否人爲的情況下，裴文中的看法引起議論，而步達生和楊鍾健似乎都持否定的態度。[127] 德日進當時並未直接介入爭論，但是建議邀請他自己的前輩兼同事，也是當時在國際舊石器文化研究有權威地位的步日耶來鑑定。一九三〇年底，先由德日進將一塊帶有燒痕的鹿角根帶到巴黎，交由步日耶鑑定，並請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礦物研究室進行化學分析。北京人用火的事實因此初步得到確認。一九三一年春，裴文中先後在猿人洞和鴿子堂兩個挖掘地點收集到石英岩片和燒過的獸骨。同年秋，步日耶應翁文灝及步達生之邀來

---

[124] 翁文灝當時在北京大學的一場通俗演講：「北京猿人學術上的意義」中，也是採用這樣的看法；見氏著，《錐指集》（北平：地質圖書館，1930），頁226。

[125] 李濟，〈紅色土時代的周口店文化〉，原刊於《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16 (1967)；後收入張光直、李光謨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165。

[126] 高星，〈德日進與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早期發展〉，《第四紀研究》（北京）2003.7：379-384。

[127] 高星，〈德日進與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早期發展〉，以及裴文中本身之回憶，見裴文中，〈龍骨山的變遷〉，原刊於《中國科技史料》2 (1982)；後收入氏著，《裴文中史前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201。

到中國，由裴文中陪同，親自到周口店現場觀察新發現的文化層所包含的化石。步日耶在隨後發表的文章中認爲，這些與中國猿人一起出土的破碎骨化石應該是人工製作的產物，並且認爲其製作技術已經脫離原始狀態，進而推論中國猿人其實已經可以靈活運用雙手製作工具，並且有相當的創造發明程度。[128] 對於步日耶這個大膽的推論，德日進在石器製作部份較無意見，但是對於骨器製作則採取較保留的立場，認爲不排除這些碎骨化石是獸類所咬碎，其中有些部份或爲人工打碎，但其目的，可能是爲取食骨髓，並不一定是猿人有製作骨器的想法。所以在步日耶這第一篇討論周口店石器和骨器工業，且在中國期刊發表的文章第一個註中，編輯群就說明文中論點只是步日耶自己的看法。[129] 德日進在稍後與裴文中聯名發表的文章中，則對步日耶的論點低調帶過，而且只提用火和石器的部份，不談骨器的部份。[130] 在一九三三年周口店工作團隊對國際學界發表的綜合報告中，[131] 德日進對骨器的部份依然堅守自己的謹慎立場，認爲必須有更確實的證據才能下結論。在他給步勒的信中，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132]

步勒本人在綜合這些看法後，也提出自己的假設。[133] 他認爲，就中國猿人頭骨等等體質人類學方面的鑑定，以及所處的地質年代的判斷，有了用火與製作石器、骨器等遺跡證據，的確可以判斷中國猿人接近尼安德塔人等現代人的祖先，而不是猿類。然而，若依照當時所斷定的石器製作程度，又很難相信是出於生理體質都還很原始的中國猿人之手，所以他推論，由於同一出土地點沒有見到較長的人骨部份，都只是頭部和下顎骨等部份，這些石器之製作者可能另有其人，而我們看到的中國猿人頭骨是被這些石器製作者，也就是較先進的人類，從別處帶回來的戰利品。依照步勒的推論，我們不應該把中國猿人視爲是周口店這

---

[128] Henri Breuil, “Le feu et l’industrie lithique et osseuse à Choukoutien,”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中國地質學會誌 11.2 (1931): 147-154.

[129] 同前文，頁147。

[130]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Pei Wen-Chung, “The Lithic Industry of the Sinanthropus Deposits in Choukoutien,”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中國地質學會誌 11.4 (1932): 317-358.

[131] 即 Black, Teilhard de Chardin, Young and Pei, “Fossil Man in China” 一文，此係周口店工作團隊為了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第十六次國際地質學會議，以及在加拿大舉行的第五次太平洋學術會議而撰寫，目的在於報告周口店工作成果及對於中國北方新生代的研究。

[132]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信；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221.

[133] 見前引步勒相關文章。這些文章的內容後來被直接用於《化石人類》一書的增訂版中，亦即一九四六年出的第三版。

塊地域的主宰者，而他很可能只是我們還沒找到骨頭化石的另一批人的食物或手下敗將，就像是其他在現場看到的動物骨頭化石一樣。這樣的假設最後沒有被採納，主要是因爲在周口店遺址未發現有其他可證明他種人類存在的證據，而陸續出土人類化石又具有一致性。[134]

步日耶與德日進在骨角器方面的不同看法並沒有影響到他們的私人友誼，但是對於一起工作的年輕中國學人而言，兩派看法有不同的支持者。直到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裴文中與賈蘭坡爲此仍有爭論。原本全盤採納步日耶之說的裴文中最後選擇和德日進一樣採取謹慎保守的立場，而賈蘭坡則遵守步日耶的分析。[135]

二・對於中國黃土的研究與對應表之建立

相對於在化石鑑定工作上對歐洲的依賴，德日進在黃土研究上，則倚賴在中國當地工作的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並且逐漸揚棄了歐洲通行的對應表，而企圖建立一個適用於中國地質特性和考古遺址表現的對應表。

就如前面所述，德日進到中國之初懷抱的夢想，便是要在中國尋找「黃土形成之前的人類」，但是在他陸續的地質調查和化石挖掘上，卻一再遭逢到黃土帶給他的挑戰。德日進一直嘗試著對中國北方的黃土和古土壤形成環境做研究，以進一步判斷當時生物生存的氣候條件。他在信中也多次提到對於不同地區黃土形成的現場觀察。但是從其信中反覆提到的問題，可見其研究所遭遇的困難。

事實上，當時由於缺乏現在的定年技術，學界對於黃土地層的研究，存有許多爭議。在德日進之前，對於中國黃土地層研究提出一套說法的，最早當屬德人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136] 他在一八七七年出版的《中國》一書第一卷中，對黃土的成因、厚度和時代問題提出看法。安特生在其一九二三年出版的《中國北部之新生界》一書中，則對李希霍芬的黃土地層劃分提出

---

134 例如德日進在一九三三年的報告 “Fossil Man in China” 中，就已經提到當時流傳的這種看法，但是他認為證據不足，終究是一項無法採納的假設；見該文第三部份。

135 見裴文中，〈關於中國猿人骨器問題的說明和意見〉，原刊於《考古學報》2 (1960)；後收入氏著，《裴文中史前考古學論文集》，頁41-48。

136 李希霍芬被認為是現代地理學奠基者之一。他在一八六八至七二年間在中國進行幾次地理考察，對於中國疆域內的自然地理與地質認識有所收穫。在一九〇七年才出版完全的《中國》一書共五卷，被認為是有關中國地理研究的主要參考書，尤其是對於絲路的部份。有關研究可參考期刊《第四紀研究》在二〇〇五年七月出版的專號。

了修正，認爲應該把三趾馬紅黏土層與黃土層分開。德日進在他與楊鍾健合作的研究，發表於一九三〇年的〈山西西部陝西北部蓬蒂紀後黃土期前之地層觀察〉一文中，更進一步把馬蘭黃土之下，三趾馬紅土之上的一段地層命名爲紅色土，認爲既不能算是典型黃土，也不能算是紅土。[137] 並根據動物化石將此紅色土分爲A、B、C三個帶，分別屬於上新世早期、泥河灣組、周口店階，算是正式開啓了中國黃土的生物地層的研究。

事實上，隨著德日進在中國田野發掘經驗的增加，他在化石鑑定上，逐漸建立一個中國當地的對照系統。一九三〇年代的德日進因爲對泥河灣動物化石有了豐富的研究，他對周口店發現中國猿人化石地點的動物化石，乃至於後來對山頂洞人發掘地點出土的動物化石研究都愈來愈有心得。他並且不斷地將從中國各地陸續發現的化石研究成果納入一個整合系統中，企圖建立一個用中國史前考古成果來標定的文化分期表，而不再是一直依賴與歐洲系統的比對。

例如，前面提過，他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即初步判斷出周口店的侵蝕與堆積週期狀況。並且認爲應該比「黃土期」早，但是不確定與泥河灣是否屬於同一週期內，或是一個較晚的週期。他之後幾年到處考察的結果，加上之前威理士(Bailey Willis)、丁文江、安特生和同時期巴爾博等人的研究成果，到了一九三三年，他們已經可以整理出中國新生代後期地文的五個週期。[138] 而從地層的角度上看，也斷定周口店堆積比「黃土期」較早，比三門系（泥河灣堆積）較晚，但是當時尚無法確知到底屬於更新世中期或晚期。

在中國從事史前研究的初期，德日進遭遇到的困難之一，便是中國地區的考古發現與他原本熟悉的歐洲系統之間對應的問題。當時歐洲通用的第四紀地質、古生物和史前文化分期的對應表，都是以歐洲，尤其是法國發現的史前遺址來命名。此分期對應表的內涵是在十九世紀後半葉逐漸形成，由法國史前史學家莫提

---

[137]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Young Chung-Chien,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Pre-loessic and Post-pontian Formations in Western Shansi and Northern Shensi,"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地質專報, ser. A, 8 (Peking, 1930), pp. 1-37（楊鍾健譯，《山西西部陝西北部蓬蒂紀後黃土期前之地層觀察》〔收入《地質專報‧甲種‧第八號》，北平：實業部直轄地質調查所、國立北平研究院地質研究所，1930〕，頁1-21）。李濟在一九六七年重新整理周口店文化之研究成果時所寫成的文章就是以此為名；見李濟，〈紅色土時代的周口店文化〉。

[138] 楊鍾健，《中國人類化石及新生代地質概論》，頁87-91。

耶 (Gabriel de Mortillet, 1821-1898) 整理制訂成一個後來被廣泛使用的分期表。[139] 在這個分期表中，對於第四紀的文化分期有四期，從早到晚分別是舍利文化期 (Chelléen)、[140] 莫斯特文化期 (Moustérien)、[141] 索律特文化期 (Solutréen)、[142] 馬格德林文化期 (Magdalénien) 。[143] 每一期大致有其相對應的生物進化表現和人類石器工業的進展。[144] 在德日進與步勒的通信中，尤其是在第一時期的信件中，每每可見到「這相當於莫斯特期」、「這應該等同於舍利期吧」等字句。對於這些以歐洲（法國）考古遺址特徵來界定的對應關係，到了中國地區產生轉換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不只德日進遭遇到，包括要做比較研究的中國學者也必須面對。步日耶在一九三五年六月與德日進一起參加法國人類學學會 (Institut français d'anthropologie)[145] 的討論月會中報告「我們對周口店石器工業的瞭解現況」(L'État actuel de nos connaissances sur les industries paléolithiques de Choukoutien) 時，也提到這個中、西方舊石器文化期的對應問題，並且認爲既然周口店石器特性無法與西方當時劃分的某一單一時期對應，應該就直接稱做周口店文化期。[146]

---

[139] 見 Gabriel de Mortillet, *Le Préhistorique: Antiquité de l'Homme* (Paris: C. Reinwald, 1883). 莫提耶可說是最早用考古學方法將歐洲舊石器時代文化進行分期的學者，其分期表乃是用第一次發現的地點做為各文化期的名稱，雖然後來經過步日耶等人修正，但基礎規模是由莫提耶確立的。

[140] 此文化期是以 Chelles 遺址為代表，此係一位於 Seine-et-Marne 地區的小城市，離巴黎約十九公里。原本在制訂這個第四紀最早的文化期時，莫提耶是以在法國北部 Saint-Acheul 遺址為名，稱之為 Acheuléenne，但後來因為認為其動物化石群無法純粹代表此一時期特徵，才改為舍利期。不過後來又遭步日耶修正，改為 Abbevillien。

[141] 此文化期之代表遺址為 le Moustier，位於法國西南 Dordogne 地區 Sarlat 市，為 Peyzac 鎮的小村落。該遺址於一八六四年被發現。

[142] 此文化期之代表遺址為 Solutré，是位於法國東部 Saône-et-Loire 地區 Mâcon 市中的一個小鎮。該遺址於一八六六年被發現。

[143] 以 la Madeleine 遺址為代表，此地也在法國西南 Dordogne 地區，維澤爾 (Vézère) 河畔，是一八六三年被發現的遺址。

[144] 莫提耶所建立之歐洲第四紀分期表內容，見附錄三。

[145] 德日進與步日耶皆為該學會會員。裴文中旅法期間也曾經在該學會例會中報告。有關該學會之基本運作型態、歷年參與人員及討論主題，見戴麗娟，〈從體質人類學到文化人類學：以法國人類學學會為考察對象〉，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 92-2411-H-001-070，2004。

[146] Henri Breuil, "L'État actuel de nos connaissances sur les industries paléolithiques de Choukoutien," *L'Anthropologie* 45 (1935): 740-746.

在德日進旅華的二十多年間，中外學者依據當時陸續的發現，將周口店發現的中國猿人文化訂在更新世早期，河套文化爲更新世中期，而同樣在周口店發現的山頂洞人文化爲更新世晚期。也就是說，有關第四紀更新世時期（距今一百八十萬年到一萬年間）生活在中國地區的古人類文明的發現都一一有了定位座標。而這三種主要標定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的發現和挖掘，德日進都親身參與過，尤其是河套文化，更是他和桑志華獨立研究的貢獻。所以隨著他愈來愈投入中國古生物化石研究，以及與中國學者合作的機會增多，我們從信中可以看見他逐漸不再使用歐洲地名來思考，而使用中國地名，例如依丁文江研究命名的三門系 (Sanmênien)、[147] 依德日進與桑志華研究命名的泥河灣組等等，來思考不同遺址中發現的古代文化之先後關係。在他寄給老師的信中，可以看到幾份分期的草稿。[148] 而德日進所盡力建立的對應系統，後來也由他的中國合作者裴文中等人繼續將之細緻化。[149]

三・知識交流與人才培育

除了在鑑定工作上，德日進等法國學者發揮了相當的影響力外，在中國史前考古人才培育上，德日進也發揮了一些作用。自從決定在新生代研究室工作後，

[147]「三門系」這個地質名詞源自丁文江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在山西、河南交界處三門峽的觀察，為黃土下之砂礫層，含有大介殼類化石。發現之初，並未特別受到重視，後來經過安特生在一九二三年發表之《中國北部之新生界》中特別討論，才較為人知；見Andersson, "Essays on the Cenozoic of Northern China," pp. 117-121. 根據費俠莉所著《丁文江》一書中譯本結尾所附之丁文江學術著作目錄，安特生此書的地質學章節資料似由丁文江提供；見費俠莉著，丁子霖、蔣毅堅、楊昭譯，《丁文江》，頁210。另外根據楊鍾健的看法，在德日進的泥河灣堆積研究未發表之前，學界對三門系特徵所知甚少；見楊鍾健，《中國人類化石及新生代地質概論》，頁83。德日進在與老師的通信中最早提到此名詞是在一九二四年初，但一直到他在新生代研究室工作後才較常使用；參見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p. 157, 197. 不過，在一九三四年七月的信中，他還是認為，一旦適當的對應名詞被全面接受後，這個詞就可以擱置一旁了；同前書，頁237。

[148] 見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和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的信；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p. 201, 237。分期表內容可見本文附錄四、五。

[149] 見裴文中，〈中國舊石器時代的文化〉，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編，《中國人類化石的發現與研究：中國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發現二十五周年紀念會報告專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頁89。其分期表內容可見本文附錄六。

德日進與中國年輕學者的合作機會增多，這點從發表的文章即可看出。有別於過去以法國刊物爲優先投稿的對象，德日進此時期在中國發行的期刊發表研究成果的次數明顯增加，包括地質調查所主持的相關刊物，如《地質彙報》（*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亦名 *Geological Bulletin*）、《地質專報》（*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亦名 *Geological Memoirs*）、《中國古生物誌》(*Palaeontologia Sinica*)，[150] 或中國地質學會的刊物，如《中國地質學會誌》(*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都可見到他以英文發表的文章，其中不乏與中國學者一起掛名者。

在中國青年學者中，與德日進合作較多者當屬楊鍾健和裴文中。由於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任務的分配關係，他與楊鍾健聯合掛名發表的工作報告較多，但是與裴文中的工作情誼，則因爲裴文中後來赴法深造，以及抗戰期間一起留守新生代研究室等因緣而顯得深厚。

楊鍾健是北大地質系畢業生，於一九二〇年代初期赴德國慕尼黑留學，在選擇博士論文題目時，得到翁文灝指引，並取得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維曼教授的同意，以安特生與師丹斯基在周口店挖掘到的化石，後來存放在維曼教授研究室的一批嚙齒類化石爲整理研究的對象。畢業後回到中國，正值周口店發掘計畫展開，新生代研究室創立，楊鍾健在翁文灝安排下，成爲研究室副主任，協助主任步達生推動多項事務。由於步達生對新生代研究室的規劃頗爲宏大，並不侷限於周口店的工作，而是希望對於中國疆域內的新生代地質作普遍的調查，楊鍾健與名譽顧問德日進從一九二九年起便展開了一系列的地質調查旅行。[151] 兩人第一次一起執行野外考察是一九二九年夏天的山西、陝西之行，目的在於考察山西西部及陝西北部分佈極廣之黃土下紅土堆積的地質年代。這個工作其實是對於德日進與桑志華於一九二七年在汾河下游所觀察到的「紅色黃土」做進一步的考

---

[150] 有關這幾份刊物在一九二〇至四八年的出版目錄，見潘江，〈前地質調查所 (1916-1948) 出版事業概況〉，程裕淇、陳夢熊主編，《前地質調查所 (1916-1950) 的歷史回顧》，頁89-117。在這幾份刊物中，以創於一九二二年的《中國古生物誌》最為重要。該刊為不定期刊物，分甲、乙、丙、丁四種，分別出版中國古植物學、中國無脊椎動物化石、中國脊椎動物化石，以及中國古人類與文化四類專著，當時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工作的中外學者皆在作者群中，所以其中以英文著作居多，另再附上中文節要。德日進的作品多在丙種出版。

[151] 楊鍾健，《楊鍾健回憶錄》，頁67-75。

察。[152] 這三個月的田野調查成果於一九三〇年發表在《地質專報》上，也就是前面提過的〈山西西部陝西北部蓬蒂紀後黃土期前之地層觀察〉一文，一般認爲該文對於華北黃土性質研究有了里程碑式的貢獻。德日進早在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及十月十三日給老師的兩封信中，便詳細敘述了這次考察的行程與成果。[153] 由於是自己之前研究的延續，在此二信中他其實已經對一九三〇年發表的報告中討論的問題進行初步分析。另外，在七月底的那封信件末尾，也許是爲了安慰老師，但或許也是某種實情的感受，德日進分析他成爲地質調查所顧問，以及和中國學者合作的好處：「原有傳教士接待的好處並不會失去，而我在此受到中國民政和軍政當局很好的對待，他們給地方住，又給麵粉、果醬、果汁等必需品……」。[154] 若他提到的這些事情也成爲可以說服老師自己最後選擇加入中國當地學術機構的理由，一方面可想見他過去和桑志華所組成的法國二人考察團，在軍閥割據下的中國，爲了田野工作所經歷過的困難；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德日進在決定留在中國長期工作之初，仍有複雜的感受，所以也必須自我說服。

至於同行者楊鍾健的想法，根據他本人的回憶錄，這是他第一次長途地質旅行，與德日進同行，「沿途相與討論，獲益不少」。而德日進在田野「又以神父身分出現，在有天主教的地方可以借住，尤其得到便利不少」。只不過是「那時一般人尚有崇拜洋人的心理，見了中國人和洋人在一起，總以爲中國人是侍候他們的，或是買辦者之流，所以我與之同行，心理上也有一番痛苦，幸我問心坦然，且同行者均受我節制，尚覺無意外岔子」。[155]

一九三〇年，兩人又有三次遠途考察的合作。先是年初與步達生、裴文中一起到唐山觀察當地挖掘出之化石。該年春，兩人又與王恒升 (1901-2003) 等人同

[152] 德日進與桑志華兩人的調查報告見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Émile Licent, "Observations sur les formations quaternaires et tertiaires supérieures du Honan septentrional et du Chansi méridional,"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中國地質學會誌 6.2 (1927): 129-148.

[153] 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信；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p. 196-197.

[154] 原文是：Sans perdre le bénéfice de l'accueil des missionnaires, je suis admirablement reçu par les autorités civiles et militaires chinoises: on nous héberge, on nous donne de la farine, des confitures, du sirop... 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197.

[155] 見楊鍾健，《楊鍾健回憶錄》，頁68，此次地質旅行，除他們二人之外，另有「一名廚子、一名技工、一名服務員，加上騾子和騾夫」。

行赴葫蘆島、哈爾濱等地調查新生代地質發育狀況。同年五月，兩人以中方代表的身分，被派去參加紐約自然史博物館所組織的中亞考察團，讓標本遭到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扣留的這個考察團得以在接受交換條件的情況下，繼續到蒙古高原進行考察工作。提到此次旅行時，楊鍾健認爲他從德日進處學習了不少野外採集化石之技術。[156] 一九三一年則有所謂的中法科學考察團，其實是法國雪鐵龍汽車公司爲展示其汽車性能，並證明可用汽車走完絲路而舉行的「黃色亞洲巡航之旅」(Croisière jaune/Expédition Citroën Centre-Asie)，[157] 科學考察於其中只是附帶性質。但由於中國政府自一九二八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成立後即規定所有外國考察團必須有中方人員參加始得成行，中方遂派了科學家、軍事人員、新聞記者等七人參加此考察團。楊鍾健爲其中一員。而德日進由於是法國主辦單位主動邀請參加，此次不算是中方的一份子。這次旅行，兩人僅作了一些地文考古方面的觀察，收穫不大。楊鍾健對於此次旅行印象極差，對於中法雙方參與人員皆有批評，中方代表並且因爲在行程安排上與法方不合，中途即自行打道回府，未走完全程。[158] 不過對於德日進個人而言，有了這次旅行的觀察，他成爲少數親自到過戈壁、中國東北以及青康藏高原觀察的地質學家，[159] 並且開始進行一個蒙古與中國第四紀的大型比較計畫。

一九三二年春，兩人則有井陘、平陸之行，並到安特生發現的仰韶地點做紅土層的地層觀察和化石採集。一九三四年，調查地點已經推到長江流域，兩人與

---

[156] 楊鍾健，《楊鍾健回憶錄》，頁70。

[157] 此為雪鐵龍公司繼在非洲舉辦的兩次大型越野車隊旅行之後，所舉辦的第三次車隊遠征。此次亞洲遠征計畫是希望實地走訪一次李希霍芬所研究出來的，連接中國與歐洲的「絲路」。此次車旅分東西兩隊，西隊由雪鐵龍總經理 Georges-Marie Haardt (1884-1932) 親自領隊，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四日從貝魯特出發；東隊由一海軍上尉 Victor Point (1902-1932) 領隊，一九三一年四月六日從天津出發。總參與人數有二十多人。兩隊人馬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八日在新疆阿克蘇會合，並從烏魯木齊開車往北京，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到達，總共行經一萬二千一百一十五公里。總領隊 Haardt 在旅程最後階段，要前往越南搭船返回法國前，因病過世於香港。另一領隊 Point 也在返回法國後自殺身亡，為該次遠征留下各種傳說。有關該次遠征細節，可參考當時參與者所出版的紀念冊：Georges Le Fèvre, *Expédition Citroën Centre-Asie: la Croisière jaune, troisième mission Georges-Marie Haardt-Louis Audouin Dubreuil* (Paris: Plon, 1933).

[158] 見楊鍾健，《西北的剖面》（北平：西四兵馬司地質圖書館，1932）；後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第四輯，西北民俗文獻，第7卷，頁283-480。

[159]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信；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219.

美國學者巴爾博、瑞典地質學者那琳 (Erik Norin) 等人一同考察廬山泥礫堆積，目的是要對於李四光提出的揚子江流域第四紀冰期問題進行廬山部份的現場調查，結果是「大家意見未能一致」，但是中國第四紀冰川之有無當時成了中外地質學界討論焦點之一。[160] 一九三五年春，楊鍾健、德日進與裴文中三人又前去調查兩廣地區的洞穴堆積。

在楊鍾健的回憶錄中寫到，他與德日進一起工作近十年之久，又有多次野外長途旅行，完全沒有不愉快事件是不可能的，但是「除極少幾次摩擦外，可以說相處無間」。[161] 他又認爲德日進學問淵博，野外考察經驗多，是「名符其實的顧問」。[162] 儘管如此，在周口店化石研究工作分配上，德日進並沒有任何優先權，反而必須等到中日戰爭爆發後，由於中國學者大多南遷，他才接手這方面的研究。楊鍾健在回憶錄中是這樣寫的：

> 我們在野外和周口店採集的標本，是由我提出研究計畫的。我因他相處多年，覺得不讓他研究一部份材料似不合適，擬分給他一部份。此意翁先生不甚同意，認為凡我們能作者，不必令他擔任。但事實上，他終於分得了周口店第九地點之化石研究任務。以後戰事一起，我們將一切留於北平。他在我們南行以後，才接著研究了周口店的許多材料。[163]

兩人一起旅行的調查報告大多由兩人共同掛名，用英文發表在《地質專報》、《中國地質學會誌》等刊物。[164] 事實上，除了採集化石的技術等等，德日進的論文寫作風格對於楊鍾健也是有影響的。楊鍾健的看法是這樣：

> 他號為法人，而英文相當好，且他寫的文章能保持法國人的作風，既不如德國派文章之長，而且頭緒又清，亦不像英國許多作品失之於太簡陋。他喜歡用腳注，因為這樣可以把次要的東西提出來，使正文更加貫注。我的作品也多少受了他的影響。[165]

---

[160] 張九辰，《地質學與民國社會：1916-1950》，頁229。

[161] 楊鍾健，《楊鍾健回憶錄》，頁80。

[162] 同前書，頁80。

[163] 同前書，頁81。

[164] 兩人聯合掛名發表的文章共有十篇，例如 "Fossil Mammals from the Late Cenozoic of Northern China," *Palaeontologia Sinica* 中國古生物誌, ser. C, 9 (Peking, 1931), vol. 1; "On the Mammalian Remains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Anyang," *Palaeontologia Sinica* 中國古生物誌, ser. C, 12 (Peking, 1936)，另有兩篇是多人掛名，而兩人皆有參與的文章。

[165] 楊鍾健，《楊鍾健回憶錄》，頁81。

事實上，德日進在給步勒的信中經常提到手邊正在做的事，替楊、裴兩位重整 (refondre) 甚至重寫 (ré-écrire) 英文文章似乎也是他的工作之一。[166] 在一九三一年才加入周口店工作的賈蘭坡在他的回憶短文中，則提供了德日進幫忙修改文章的細節：

>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開始後，周口店的主要發掘雖然停止了，但在北京的研究工作仍然勉強維持。他和楊鍾健商量之後，把中央研究院交來的河南省濬縣殷代遺址出土的馬骨交給我來研究。囑我辨識出匹數、年歲、性別以及是否有驢或騾等等。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任務，但是我為了更好地學習，還是把任務接受下來了。報告寫完之後，交給了德日進神父，他改動了很多，用他那文雅而秀麗的字體，把我那大約二十頁上下的英文稿逐字逐句修改得密密麻麻的。我相信改我的那份稿子比他自己寫還要費力得多。可惜稿子沒有來得及發表就由於戰爭的原因遺失了，那份修改稿如能保存到今天，倒是十分好的紀念品。事過境遷，稿子如何寫的和如何改的都不記得了，只記得共有72匹馬和多數是年歲較大的個體。[167]

在楊鍾健之外，中國學者裏與德日進合作最多者應屬裴文中。德日進也促成裴文中到法國學習、取得博士的機會。裴文中爲一九二七年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畢業之學生，因爲成績平平，初期未能如願地進入地質調查所工作。經過努力表現和自學，在翁文灝「感其誠意，允其入所」後，於一九二八年進入地質調查所。[168] 周口店遺址展開發掘工作後，原本負責野外發掘監督的李捷 (1894-1977) 因有其

---

[166] 一九三二年四月五日信；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223. 此信中提到的修改文章分別是 Young, “On the Artiodactyle from the Sinanthropus Site at Choukoutien” 和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Pei, “The Lithic Industry of the Sinanthropus Deposits in Choukoutien”。另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的信中，德日進也提到必須要幫楊、裴即將付印的兩篇文章做修改，甚至重寫部份段落的工作；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p. 230. 此二文章即 Pei Wen-Chung, “On the Carnivora from Locality 1 of Choukoutien,” *Palaeontologia Sinica* 中國古生物誌, ser. C, 8 (Peking, 1934), 1: 1-216; Young Chung-Chien, “On the Insectivora, Chiroptera, Rodentia and Primates Other than Sinanthropus from Locality 1 at Choukoutien,” *Palaeontologia Sinica* 中國古生物誌, ser. C, 8 (Peking, 1934), 3: 1-160. 由於這些都是上百頁的文章，可推想此工作花費德日進相當的時間，所以才會在與步勒的信中提及。

[167] 賈蘭坡，〈我所認識的古生物學大師——德日進〉，《化石》1982.1：4-5。

[168] 見楊鍾健，《楊鍾健回憶錄》，頁62。

他任務，由裴文中接任其工作。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裴文中挖掘出第一個北京人頭蓋骨，一夕成名。後又因發現炭化的獸骨，引起北京人是否知道用火等問題的討論，在德日進協助下，開始與法國專家們接觸。一九三一年，步日耶來華，德日進因爲參與法國雪鐵龍公司舉辦的中法考察團而無法親自接待步日耶，由裴文中及巴爾博擔任嚮導，陪伴步日耶參觀周口店發掘工作。步日耶並且鑑定了裴文中在當地發現的石英岩片，確定是人工製品。一九三五年，裴文中決定赴法深造，[169] 德日進遂請步日耶與自己的老師步勒親自指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三七年七月，裴文中在法留學過程，主要便是在由步勒和步日耶兩人共同主持的古人類學中心、步勒主持的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古生物研究室，以及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使用其系列收藏，[170] 進一步學習比對和辨識的工作。另外，他也在巴黎大學的動力地質研究室實習，有助於他瞭解假石器形成過程，分辨人造石器和假石器之差異。除了這類在研究室的學習，裴文中並且跟隨步日耶到歐洲各地的考古遺址做實地觀察。[171] 最後裴文中以「自然現象在史前人類所用岩石之碎裂與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Le rôle des phénomènes naturels dans l'éclatement et le façonnement des roches dures utilisées par l'Homme préhistorique)[172] 爲題做成論文，取得博士學位。

前面提過，裴文中雖然是步日耶的學生，但是對於周口店遺址的骨器問題，他原本追隨步日耶的想法，最後卻採取與德日進一樣謹慎的態度，在證據無法確認的情況下，不願對於中國猿人製作器物的文明程度做過份的推想。因此也在一九五〇年代，與全盤接受步日耶看法的賈蘭坡有所辯論。

中日戰爭爆發後，發掘工作被迫中斷，原來在周口店工作的中外學者或是南遷，或是告別中國。自國外開會返國不久的裴文中原本也要往南部遷移，被協和

---

[169] 裴文中此行獲得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補助；見楊翠華，《中基會對科學的贊助》（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頁178。

[170] 有關此博物館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情況，見戴麗娟，〈法國人類學的博物館時代——兼論人類學物件之特性及實證人類學之建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7.4 (2006)：627-696。

[171] 見裴文中，〈法國史前遺址探訪記〉，《旅行雜誌》10.6 (1936)：45-69。

[172] 這篇論文在一九三六年曾經發表在法國期刊 *Revue de Géographie physique et de Géologie dynamique* 上，中文譯文〈論史前石器和假石器〉，收入裴文中，《裴文中史前考古學論文集》，頁1-40。

醫學院主任慰留後，取代楊鍾健成爲副主任，與德日進一起成了新生代研究室最後的守護者，[173] 兩人並且繼續完成了一些研究工作，還合著了一本專書。一九四六年四月初德日進返回法國。一九四九年後，大多數的外國顧問都已離開，裴文中等人成了中國史前學方面的主導人物，並繼續許多前期的研究，在原來中外合作的基礎上，進一步建立中國疆域內史前時代的文化系統。裴文中「從不識豬牙鹿骨之人，一變而成爲古生物學家，世界學者莫不聞知他的大名」，[174] 除了他本身的努力外，德日進、步日耶等人的訓練也有一定的幫助。一九七〇年代晚期，在文革等事件造成的壓抑狀態逐漸解除之後，裴文中主動與法國考古學界聯繫，等於在其辭世前不久，爲中法考古合作關係重續了前緣。

伍・結語

在德日進一生發表的兩百多篇長短不等的科學性著述中，有一百多篇與中國哺乳動物化石、新生代地質、史前考古有關。[175] 在他旅華二十三年期間，先後發表了八部獨立成冊的動物群專著，包含了十多個遺址的動物群分析，爲中國新生代晚期的哺乳動物群及其相關地層做了可靠的排序。[176] 本身被譽爲「中國考古學之父」[177] 的李濟認爲，德日進「所發表的工作報告，差不多全是示範性的。中國的化石專家、地質學家及史前考古學家，大半都受到了他很有益的影響」。[178] 也就是說，德日進對於中國史前考古研究的貢獻，不管是在質或量方面，很早就受到中國學者的肯定。本文處理的問題因此不在於討論德日進的學術貢獻，而是希望藉著新近出版的德日進書信集來觀察德日進在長期駐留中國田野後，在工作心態、科學思考，乃至於實際操作上的轉變。

---

[173] 新生代研究室在一九五〇年代發展成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

[174] 引自翁文灝為《周口店洞穴層採掘記》所寫之序言；見裴文中，《周口店洞穴層採掘記》，收入《地質專報・乙種・第七號》（北平：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國立北平研究院地質學研究所，1934），頁2。

[175] 見 Teilhard de Chardin,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所附書目，頁279-287。

[176] 李傳夔，〈德日進與中國古哺乳動物學〉，《第四紀研究》（北京）2003.7：374。

[177] 張光直，〈懷念李濟 (1896-1979)〉，收入李光謨，《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1。

[178] 李濟，〈紅色土時代的周口店文化〉，頁165。

從這份書信集裏，我們可以看到，這一位對中國史前考古頗有貢獻的法國學者與中國土地的接觸，一開始是由於法國科學機構的外派任務。這段時期他所表現的，對法國科學機構的效忠，對於自己任務的認知，對於與他國競爭的焦慮，都與 Latour 在其科學史論著中所提出，以歐洲科學機構爲計算中心所形成的長程資料蒐集網絡的描述不謀而合。由於德日進的忠實報告，步勒雖身在巴黎的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這段期間從未到過中國，卻可以遠距離掌握中國史前考古的動態，並且可以將之與世界其他地區傳回巴黎的新發現做比較，有效地更新學界在世界史前史方面的知識。他並且因爲參與中國出土的化石鑑定，對中國舊石器時代有一番系統性的瞭解，得以與實際的挖掘者桑志華、德日進，以及另一名鑑定者步日耶共同掛名出版有關中國舊石器時代的法文專書，讓法國學界對於中國史前文化有一手的認識。這一切得以順利進行，必須要派在遠方田野工作的人員能夠有效地觀察與採集，並且將資料無誤地傳送給中心學者。而在學術中心的學者也必須提供外派人員知識和經費上的支援，使其得以解決在田野上遇到的問題。德日進在工作中一再遇到的查證和比對等化石鑑定的問題，便是其中之一。從德日進的例子可以看出，運送化石到法國，一方面固然是當時西方國家這類外派考察團的本質，目的在於豐富學術中心科研機構的收藏和研究，另一方面卻也有其鑑定工作上的實際需求，所以不是單純的掠奪概念可以解釋的狀況。事實上，因爲當時中國本地缺乏相關專家和系列收藏，即使連丁文江有時也得將其所需鑑定的化石標本寄往國外。這也是爲什麼德日進在第二個時期，即使沒有權利，也沒有義務將標本寄到法國，仍在必要的時候，經過中方同意，將標本寄往法國鑑定。這樣的方式，再加上邀請專家如步日耶到周口店現場勘查，或者促成年輕學者如裴文中直接到法國學習等等方式，都相當程度地彌補了當時中國專家不足的缺憾，而使考古研究得以順利進行。當然，在瞭解這一點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在中方未能有效控制的情況下，大批標本運往國外，即使得到較好的保存和研究，卻也可能損害了中國當地正在形成的科學社群未來研究的便利性。

從這個角度來看，地質調查所在一九二〇年代與外國簽訂合作協議時，能夠維護出土物的所有權，同時開放給在中國工作的中外學者共同研究，並要求研究成果優先發表在中國刊物上，其實已經相對有效地矯正西方主導、西方優先的情況，同時又有效地利用外國專家的知識和技術在短時間內促進中國相關領域的發展。然而丁文江等人這種認清中國自身不足、有效開放合作的作風在民族主義情

緒高張的環境中，仍飽受批評。在與赫定所帶領的考察團交涉的例子中，因為一群缺乏地質、考古專業訓練，卻一昧要保衛「國寶」的人士介入後，不僅地質調查所被譴責與排擠，而且在缺乏專業人員整理與專門機構保存的情況下，許多標本後來皆在戰亂中下落不明。[179]

回到德日進的個案上，我們從此書信集中可以看到，作為一個短期外派人員，德日進原本並未打算與中國當地學術社群有太多接觸。然而，教會的懲戒，使得他必須暫時遠離法國；桑志華的要求協助，使得他又回到中國；而駐在中國的中外學人之邀請，再加上周口店豐富的出土材料之吸引，使得他最後終於決定留在中國，進一步融入中國當地新興的現代考古學術社群。這樣「在地化」的結果，也意外地讓德日進更加「國際化」。因為中國此時的考古事業原本就是一個中外合作頻繁，具有國際性格的領域，而世界考古學界又正好把焦點放在亞洲，德日進從一個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外派的研究人員，變成組織化的周口店考古事業的挖掘與鑑定顧問，最後由於長期的亞洲考古經驗，而終於成為國際學術圈以中國和亞洲考古為專業的社群所倚重的一份子。

然而，在中國長期工作並未讓德日進因此放棄任何與法國學界聯繫，以及到世界其他地區考古的機會。不同的是，相對於前一個時期，德日進以法國巴黎為中心，在中國只是外派的型態；在第二個時期，德日進逐漸變成以中國北京為根據地，間歇參與了多項亞洲與非洲考古發掘的工作，回去法國的時間反而顯得微不足道。他先是在一九二八、二九年間，接受法國探險家 Henri de Monfreid (1879-1974) 的邀約，到非洲衣索比亞和索馬利亞進行探勘工作。接著在一九三○年，以中方代表身分參與紐約自然史博物館組織的中亞考察團到戈壁。一九三一至三二年，又參加法國雪鐵龍集團所舉辦的黃色亞洲巡航之旅，擔任該團唯一的古生物學家。一九三五年參加耶魯、劍橋的印度探險，一九三六年赴爪哇踏勘，一九三七至三八年則是與哈佛、卡內基合辦的考察團到緬甸。他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回到中國後，在北京一直待到一九四六年四月才返回法國。一九五○年，德日進當選為法國科學院院士。最後他接受美國考古學界友人的邀請，於一九五一年定居美國，並且在一九五一、五三年還到南非主持考古計畫，最後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十日病故於紐約。

[179] 見李學通，〈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組建中的爭議〉。

從現存的德日進傳記，以及晚近出版的這份書信集所提供的細節，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田野渡過二十多年的德日進始終沒有忘記他的法國老家，卻因爲長期在外從事考古活動，讓他逐漸以天地宇宙爲家。德日進也始終沒有忘記上帝，但是他從各地生物演化的考察中，更新了神學中對於人類起源的解釋。德日進始終沒有時間學好中文，但是對於中國現代科學的發展，他的奉獻，並未因此稍減。

（本文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初稿寫成於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定稿完成於二〇〇七年七月，修改過程中參考了兩位審查人以及邢義田、陳玉美、陳光祖三位教授的寶貴意見，筆者在此向他們表達感謝之意。另外筆者也要感謝蔡淑貞、崔雅慧兩位小姐專業且細心的校對。當然，文中所有可能的錯誤，仍由筆者自負文責。

附錄一：德日進致步勒信件統計表

年代	信件數量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923	19	0	0	0	0	2	2	3	2	2	3	1	4
1924	15	3	1	1	4	2	0	2	1	1	0	0	0
192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926	12	0	0	0	0	1	2	1	2	1	2	1	2
1927	7	1	1	0	1	2	1	1	0	0	0	0	0
1928	2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929	10	3	1	1	0	1	1	1	0	0	1	0	1
1930	7	1	0	2	0	2	1	0	1	0	0	0	0
1931	2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1932	3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1933	2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1934	2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1935	2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1936	3	1	0	1	1	0	0	0	0	0	0	0	0
1937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93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939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940	2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總計	90												

附錄二：通用地質年代表 (Geological Time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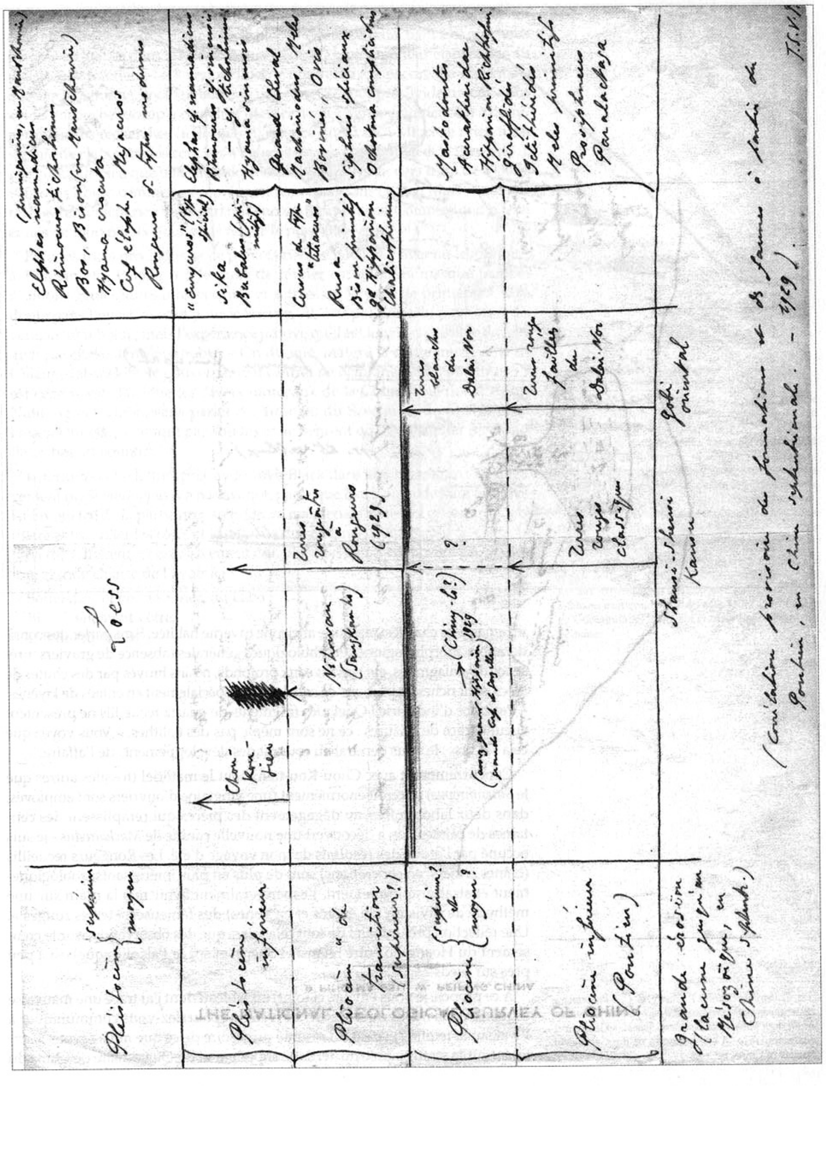
宙 EON	代 ERA	紀 PERIOD	世 EPOCH	距今大約年代 (百萬年)
顯生宙 Phanerozoic	新生代 Cenozoic	第四紀 Quaternary	全新世 Holocene	0.01
			更新世 Pleistocene	1.8
		第三紀 Tertiary	上新世 Pliocene	5.3
			中新世 Miocene	23.8
			漸新世 Oligocene	33.7
			始新世 Eocene	54.8
			古新世 Paleocene	65
	中生代 Mesozoic	白堊紀 Cretaceous		144
		侏儸紀 Jurassic		206
		三疊紀 Triassic		248
	古生代 Paleozoic	二疊紀 Permian		290
		石炭紀 Carboniferous		354
		泥盆紀 Devonian		417
		志留紀 Silurian		443
		奧陶紀 Ordovician		490
		寒武紀 Cambrian		543
元古宙 Precambrian	元古代 Proterozoic			2500
太古宙 Archaean	太古代 Archaeozoic			4600

附錄三：莫提耶建立之第四紀分期表 (Tableau des Époques quaternaires)[180]

NOMS	CLIMATS	ACTIONS GÉOLOGIQUES	PALÉONTOLOGIE VÉGÉTALE	PALÉONTOLOGIE ANIMALE	INDUSTRIES
Quaternaire le plus récent Magdalénien	Froid et sec	Formation du dépôt atmosphérique à graviers anguleux dit diluvium rouge. Niveaux actuels.	Mousses polaires en Wurtemberg	Homme, race de Laugerie-Basse. Grand développement de la faune du Nord, renne, saïga, etc. Extinction du mammouth, *Elephas primigenius*.	Gravure et sculpture. Instruments en os. Déchéance de la pierre; lames abondantes; burin, forme caractéristique; doubles grattoirs.
Solutréen	Température plus douce	Relativement très courte. Continuation des terrasses. Retrait des glaciers.		Homme? Chevaux très abondants. Développement du renne, *Cervus tarandus*. Mammouth, *Elephas primigenius*. Plus de rhinocéros.	Vers la fin, apparition des instruments en os. Perfection de la pierre; pointes à cran taillées d'un seul côté; pointes taillées sur les deux faces et aux deux bouts; origine et large développement des grattoirs.
Moustérien	Froid et humide	Grande extention des glaciers. Formation des terrasses. Déblaiement des vallées. Exhaussement du sol.	Lignite de Jarville avec flore du nord. Tufs de Resson	Homme, race de l'Olmo et de Néanderthal. Bœuf musqué. *Ovibos moscatus*. *Ursus, spelœus*. *Elephas primigenius*. *Rhinoceros tichorhinus*.	Pas d'instruments en os. Dédoublement de l'instrument chelléen; pointes, râcloirs et scies retouchées d'un seul côté.
Chelléen Quaternaire le plus ancien	Chaud et humide	Lehm supérieur. Alluvions des hauts niveaux. Remprissage des vallées. Affaissement du sol.	Plantes du bassin méditerranéen dans la valée de la Seine et à Canstadt.	Homme; race de Néanderthal et de la Naulette. Développement des Cerfs. Hippopotame. *Rhinoceros Merkii*, forme pliocéine. *Elephas antiquus*.	Pas d'instruments en os. Un seul instrument à tout faire en pierre, toujours en roche locale, le coup de poing chellé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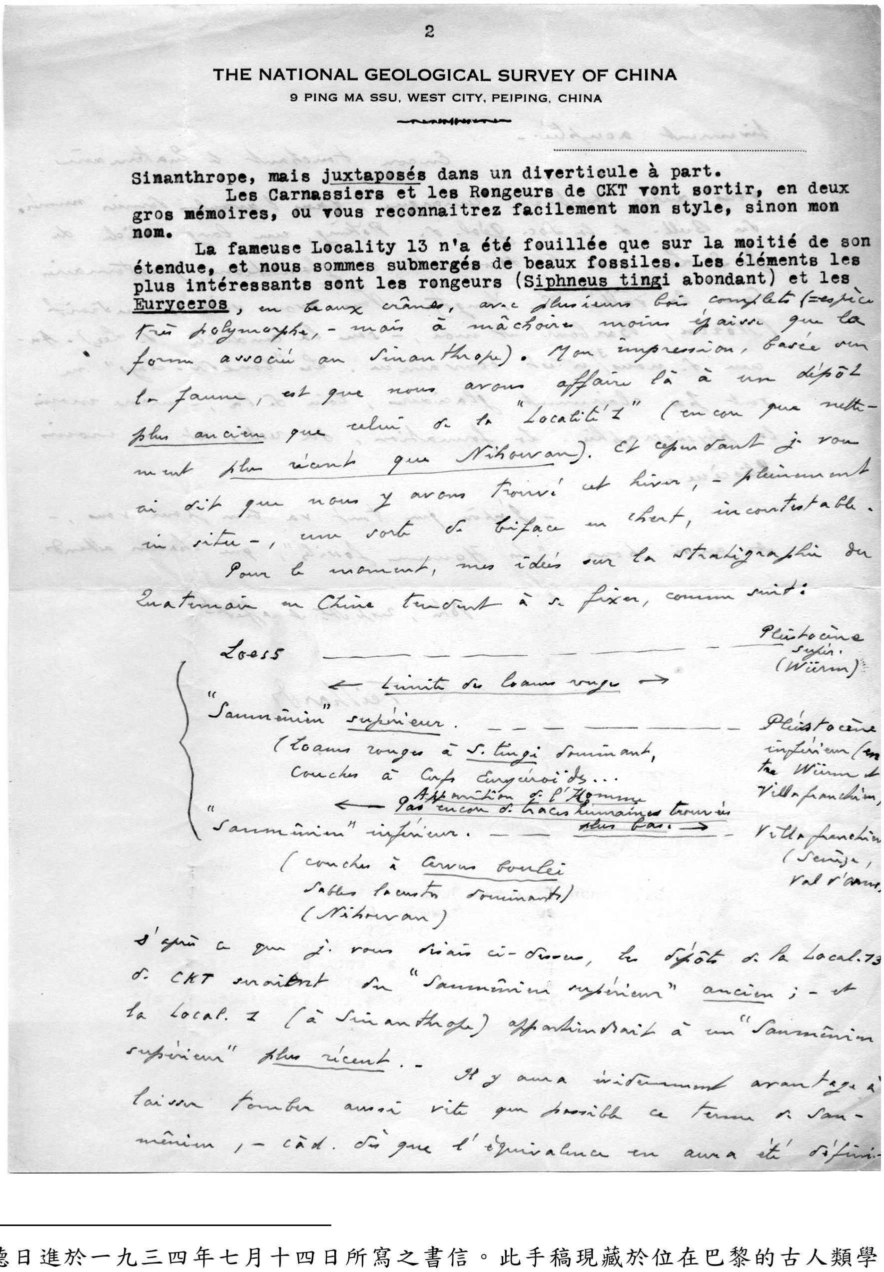
[180] 出處：Gabriel de Mortillet, "Quaternaire (Paléoethnologie)," in *Dictionnaire des Sciences Anthropologiques: anatomie, crâniologie, archéologie préhistorique, ethnographie (moeurs, arts, industrie) démographie, langues, religions*, ed. Adolphe Bertillon et al. (Paris: O. Doin, 1889), p. 944.

附錄四：德日進製作之中國舊石器時代分期表手稿 (1929)[181]



181 德日進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所寫之書信。此手稿現藏於位在巴黎的古人類學中心 (Fondation Institut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 Prince Albert Ier de Monaco)，筆者感謝該中心主任 Henry de Lumley 教授惠允使用手稿圖檔。

附錄五：德日進製作之中國舊石器時代分期表手稿 (1934)[182]



2

THE NATIONAL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9 PING MA SSU, WEST CITY, PEIPING, CHINA

Sinanthrope, mais juxtaposés dans un diverticule à part.

Les Carnassiers et les Rongeurs de CKT vont sortir, en deux gros mémoires, ou vous reconnaitrez facilement mon style, sinon mon nom.

La fameuse Locality 13 n'a été fouillée que sur la moitié de son étendue, et nous sommes submergés de beaux fossiles. Les éléments les plus intéressants sont les rongeurs (Siphneus tingi abondant) et les Euryceros, en beaux crânes, avec plusieurs bois complets (= espèce très polymorphe, - mais à mâchoire moins épaisse que la forme associée au Sinanthrope). Mon impression, basée sur la faune, est que nous avons affaire là à un dépôt plus ancien que celui de la "Localité 1" (encore que nettement plus récent que Nihowan). Et cependant je vous ai dit que nous y avons trouvé cet hiver, - pleinement in situ -, une sorte de biface en chert, incontestable.

Pour le moment, mes idées sur la stratigraphie du Quaternaire en Chine tendent à se fixer, comme suit:

Loess — Pleistocène supér. (Würm)

← Limite des Loams rouges →

"Sanmenien" supérieur. — Pléistocène inférieur (entre Würm et Villafranchien)
(Loams rouges à S. tingi dominant,
Couches à Cerfs Euryceroïdes...

← Apparition de l'Homme
Pas encore de traces humaines trouvées plus bas. →

"Sanmenien" inférieur. — Villafranchien (Senèze, Val d'Arno)
(couches à Cervus boulei
Sables lacustres dominants)
(Nihowan)

D'après ce que je vous disais ci-dessus, les dépôts de la Local. 13 de CKT seraient du "Sanmenien supérieur" ancien ; - et la Local. 1 (à Sinanthrope) appartiendrait à un "Sanmenien supérieur" plus récent. - Il y aura évidemment avantage à laisser tomber aussi vite que possible ce terme de Sanmenien, - càd. dès que l'équivalence en aura été défini-

---

[182] 德日進於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所寫之書信。此手稿現藏於位在巴黎的古人類學中心 (Fondation Institut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 Prince Albert Ier de Monaco)，筆者感謝該中心主任 Henry de Lumley 教授惠允使用手稿圖檔。

附錄六：裴文中製作之「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分期表」[183]

<table>
<tr><th colspan="2">地質時代</th><th>絕對年代（萬年）</th><th colspan="6">中國石器時代文化分期</th><th>人類化石</th><th>相當於歐洲的文化期</th></tr>
<tr><td>全新世</td><td>次生黃土</td><td>0.5-2.5</td><td colspan="6">新石器及中石器時代</td><td>現代人</td><td></td></tr>
<tr><td rowspan="4">更新世晚期</td><td rowspan="4">黃土期</td><td rowspan="4">2.5
5.0
10</td><td rowspan="8">舊石器時代</td><td rowspan="2">晚期</td><td colspan="4">山頂洞人文化</td><td>山頂洞人
資陽人</td><td>馬格德林文化</td></tr>
<tr><td rowspan="3">（河套文化）</td><td colspan="3">薩拉烏蘇河文化</td><td rowspan="3">河套人</td><td rowspan="3">莫斯特文化</td></tr>
<tr><td rowspan="2">中期</td><td colspan="3">水洞溝文化</td></tr>
<tr><td colspan="3">黃土底礫層的石器</td></tr>
<tr><td rowspan="4">更新世中期</td><td rowspan="4">周口店期</td><td rowspan="4">15
20
30
40
50
60</td><td rowspan="4">初期</td><td rowspan="4">山西襄汾丁村文化</td><td colspan="3">周口店第3及第4地點……</td><td rowspan="3">中國猿人
山西襄汾丁村人</td><td rowspan="3">阿布維利文化</td></tr>
<tr><td rowspan="2">中國猿人文化</td><td>上部</td><td>周口店第15地點</td></tr>
<tr><td colspan="2">？
下部</td></tr>
<tr><td colspan="3">周口店第十三地點</td><td rowspan="2">？</td><td rowspan="2"></td></tr>
<tr><td>更新世初期</td><td>泥河灣期</td><td>70
80
90
100</td><td></td><td colspan="5">？</td></tr>
</table>

183 出處：裴文中，〈中國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頁89。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Mortillet, Gabriel de（莫提耶）. *Le Préhistorique: Antiquité de l'Homme*. Paris: C. Reinwald, 1883.

Mortillet, Gabriel de. "Quaternaire (Paléoethnologie)." In *Dictionnaire des Sciences Anthropologiques: anatomie, crâniologie, archéologie préhistorique, ethnographie (moeurs, arts, industrie) démographie, langues, religions*, edited by Adolphe Bertillon, Auguste Coudereau, Abel Hovelacque, Cyprien Issaurat, André Lefèvre, Charles Letourneau, Gabriel de Mortillet, Henri Thulié and Eugène Véron. Paris: O. Doin, 1889.

二、近人論著

丁文江著，黃汲清、潘云唐、謝廣連編

1993　《丁文江選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于樹香

2002　〈近代法國傳教士對我國北方的科學考察與天津北疆博物院〉，《歷史教學》2002.6：35-39。

中薗英助著，楊南郡譯

1998　《鳥居龍藏：縱橫台灣與東亞的人類學先驅》，臺中：晨星出版社。

中央地質調查所

1941　《中央地質調查所概況：二十五週年紀念》，四川北碚：中央地質調查所。

中國地質調查所

1931　《中國地質調查所概況》，北平：中國地質調查所。

王仰之

1996　《中國地質調查所史》，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

王秀谷等

1969　《德日進與人類的遠景》，臺北：現代學苑月刊社。

王海燕編

1999　《德日進集》，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古物保管委員會編

1935　《古物保管委員會工作彙報》，北平：古物保管委員會。

李光謨

2004　《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李傳夔

2003　〈德日進與中國古哺乳動物學〉，《第四紀研究》（北京）2003.7：372-378。

李學通

2004　〈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組建中的爭議〉，《中國科技史料》25.2：95-105。

李濟

1967　〈紅色土時代的周口店文化〉，《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16。收入張光直、李光謨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頁128-170。

何漢威

2005　〈史語所藏丁文江檔案的收藏原委、編輯整理及史料價值舉隅〉，《古今論衡》12：3-34。

胡適

1930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後收入《民國叢書・第一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綜合類，第95冊。

胡適編

1956　《丁文江的傳記》，臺北：中央研究院。

1973　《丁文江的傳記》，增訂版，臺北：胡適紀念館。

翁文灝

1930　《錐指集》，北平：地質圖書館。

夏湘蓉、王根元

1982　《中國地質學會史 (1922-1981)》，北京：地質出版社。

高星

2003　〈德日進與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早期發展〉，《第四紀研究》（北京）2003.7：379-384。

章鴻釗

1937　《中國地質學發展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後收入《民國叢書・第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科學技術類，第88冊。

張九辰

2005　《地質學與民國社會：1916-1950》，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陳星燦

1997　《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北京：三聯書店。

2002　〈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的重要文獻：安特生致瑞典皇太子的信及其釋讀〉，《古今論衡》8：10-17。

陳星燦、馬思中

2002　〈蒙德留斯與中國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686-695。

陳錫欣主編

1994　《天津自然博物館八十週年》，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傅佩榮

1995　《自然的魅力：盧梭、席勒、柏格森、德日進》，臺北：洪建全基金會。

程裕淇、陳夢熊主編

1996　《前地質調查所 (1916-1950) 的歷史回顧：歷史評述與主要貢獻論文集》，北京：地質出版社。

楊翠華

1991　《中基會對科學的贊助》，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楊鍾健

1932　《西北的剖面》，北平：西四兵馬司地質圖書館。後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第四輯，西北民俗文獻，第7卷。

1933　《中國人類化石及新生代地質概論》，收入《地質專報・乙種・第五號》，北平：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國立北平研究院地質學研究所。

1942　〈中國新生代地質及脊椎古生物學之現在基礎〉，《地質論評》（北平）7.6：339-353。

1983　《楊鍾健回憶錄》，北京：地質出版社。

賈蘭坡

1982　〈我所認識的古生物學大師——德日進〉，《化石》1982.1：4-5。

賈蘭坡、黃慰文

1984　《周口店發掘記》，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裴文中

1934　《周口店洞穴層採掘記》，收入《地質專報・乙種・第七號》，北平：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國立北平研究院地質學研究所。

1936　〈法國史前遺址探訪記〉，《旅行雜誌》10.6：45-69。

1948　《中國史前時期之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後收入《民國叢書・第三編》，上海：上海書店，1991，歷史・地理類，第78冊。

1955　〈中國舊石器時代的文化〉，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室編，《中國人類化石的發現與研究：中國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發現二十五周年紀念會報告專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1987　《裴文中史前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德日進著，李弘祺譯

1983　《人的現象》，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戴麗娟

2004　〈從體質人類學到文化人類學：以法國人類學學會為考察對象〉，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 92-2411-H-001-070。

2005　〈二十世紀初法國體質人類學處境：以國際人類學學會為研究對象〉，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 93-2411-H-001-061。

2006　〈法國人類學的博物館時代——兼論人類學物件之特性及實證人類學之建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7.4：627-696。

Andersson, Johan Gunnar（安特生）

1923　"Essays on the Cenozoic of Northern China."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ser. A, 3. Peking.（袁復禮節譯，《中國北部之新生界》，收入《地質專報・甲種・第三號》，北京：農商部地質調查所，1923）

Andrews, Roy Chapman（安德魯）

1932　*The New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 A Narrative of the Explorations of the Central Asiatic Expeditions in Mongolia and China, 1921-1930.* New York: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drews, Roy Chapman and Henry Fairfield Osborn

1926　*On the Trail of Ancient Man: A Narrative of the Field Work of the Central Asiatic Expedition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Barbour, George B.（巴爾博）

1965　*In the field with Teilhard de Chardin.*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Black, Davidson（步達生）

1925 “Asia and the Dispersal of Primates.”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中國地質學會誌 4.2: 133-183.

1927 “On a Lower Molar Hominid Tooth From The Chou Kou Tien Deposit.” *Palaeontologia Sinica* 中國古生物誌, ser. D, 7. vol. 1. Peking.（李濟節譯，《周口店儲積中一個荷謨形的下臼齒》，收入《古生物誌・丁種・第七號》，北京：中央地質調查所，1927，第1冊）

Black, Davidson,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Young Chung-Chien and Pei Wen-Chung

1933 “Fossil Man in China: the Choukoutien Cave Deposits with a Synopsis of Our Present Knowledge of the Late Cenozoic in China.”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地質專報, ser. A, 11. Peking.（楊鍾健，《中國人類化石及新生代地質概論》，收入《地質專報・乙種・第五號》，北平：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國立北平研究院地質學研究所，1933）

Boule, Marcellin（步勒）

1920 “Découvertes paléontologiques en Chine.” *L'Anthropologie* 30: 619-620.

1921 *Les Hommes fossiles: éléments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 Paris: Masson.

1929 “Le «Sinanthropus».” *L'Anthropologie* 39: 455-460.

1937 “Le Sinanthrope.” *L'Anthropologie* 47: 1-22.

Boule, Marcellin, Henri Breuil, Émile Licent and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928 *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 Archives de l'Institut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 Mémoire 4. Paris: Masson.

Breuil, Henri（步日耶）

1931 “Le feu et l'industrie lithique et osseuse à Choukoutien.”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中國地質學會誌 11.2: 147-154.

1935 “L'État actuel de nos connaissances sur les industries paléolithiques de Choukoutien.” *L'Anthropologie* 45: 740-746.

Cuénot, Claude

1958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Paris: Plon.

1966 “Le Révérend Père Émile Licent S.J.”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indochinoises* 41: 9-83.

Fiskesjö, Magnus（馬思中）

2004 "The Sweden Connection: Swedish Archaeologists in Chinese Archaeology." 鄧聰、陳星燦編，《桃李成蹊集——慶祝安志敏八十壽辰》，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頁12-20。

Fiskesjö, Magnus and Chen Xingcan

2004 *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Furth, Charlotte（費俠莉）

1970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丁子霖、蔣毅堅、楊昭譯，《丁文江：科學與中國現代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Hurel, Arnaud

2000-2001 "La Création de l'Institut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 par le Prince Albert I^er^ de Monaco: une étape vers l'institutionnalisation de la préhistoire." *Bulletin de Musée d'Anthropologie préhistorique de Monaco* 41: 49-62.

2003 "Un prêtre, un savant dans la marche vers l'institutionnalisation de la préhistoire. L'Abbé Henri Breuil (1877-1961)." *La Revue pour l'histoire du CNRS* 8: 4-15.

Hurel, Arnaud and Christophe Comentale

2004 "Les premières missions paléontologiques françaises: 90 ans de recherches franco-chinoise dans le domaine de la géologie du Quaternaire et de la paléoanthropologie." *Dossiers d'Archéologie* 292: 18-29.

Latour, Bruno

1987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 Fèvre, Georges

1933 *Expédition Citroën Centre-Asie: la Croisière jaune, troisième mission Georges-Marie Haardt-Louis Audouin Dubreuil*. Paris: Plon.

Licent, Émile（桑志華）

1926 *Douze années d'exploration dans le nord de la Chine, en Mongolie et au Tibet (1914-1925)*. Tientsin: Musée Hoangho Paiho de Tientsin.

1929 *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 Tientsin: Musée Hoangho Pai-ho.

1932 *Les Collections néolithiques du Musée Hoang ho Pai ho de Tien Tsin*. Tientsin: Mission de Sien hsien.

Osborn, Henry Fairfield（奧斯朋）

1929 "Interruption of Central Asiatic exploration by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Science*, n.s., 70.1813: 291-294.

Pei, Wen-Chung（裴文中）

1934 "On the Carnivora from Locality 1 of Choukoutien." *Palaeontologia Sinica* 中國古生物誌, ser. C, 8. vol. 1. Peking.

1936 "Le Rôle des phénomènes naturels dans l'éclatement et le façonnement des roches dures utilisées par l'Homme préhistorique." *Revue de Géographie physique et de Géologie dynamique* 9.4: 1-75.（蓋培譯，〈論史前石器和假石器〉，裴文中，《裴文中史前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1-40）

Piveteau, Jean

1964 *Le Père Teilhard de Chardin, savant*. Paris: Fayard.

Spence, Jonathan D.（史景遷）

1967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溫洽溢譯，《改變中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4）

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德日進）

1926 "Description de Mammifères tertiaires de Chine et de Mongolie." *Annales de Paléontologie* 15: 1-52.

1931 "Le "Sinanthropus" de Péking: état actuel de nos connaissances sur le fossile et son gisement." *L'Anthropologie* 41: 1-11.

1935 "Les récents progrès de la Préhistoire en Chine." *L'Anthropologie* 45: 736-739.

1941 *Early Man in China*. Pékin: Institut de Geobiologie.

1956 *Lettres de Voyage (1923-1939)*, edited by Claude Aragonnès. Paris: Bernard Grasset.

1961 *Genèse d'une pensée: Lettres 1914-1919*. Paris: Grasset.

1971a *Dans le sillage des sinanthropes: lettres inédites de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et John Gunnar Andersson, 1926-1934*, edited by Pierre Leroy. Paris: Fayard.

1971b *L'œuvre scientifique*, edited by Nicole and Karl Smitz-Moormann. 11 vols. Olten; Freiburg im Breisgau: Walter Verlag.

1986 *Lettres de guerre inédites*, edited by François Guillaumont. Paris: OEIL.

1988 *Lettres à l'abbé Gaudefroy et à l'abbé Breuil*, edited by Gérard-Henry Baudry. Monaco; Paris: Éd. du Rocher.

1991 *Lettres de Chine: mission d'exploration Citroën-Centre-Asie, Groupe Chine de la Croisière jaune: 1931-1932*, edited by Jean-Louis Dodeman. Paris: Épigones.

2004 *Teilhard de Chardin en Chine: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1923-1940)*, edited by Amélie Vialet and Arnaud Hurel. Paris: Les Éditions du Muséum; Aix-en-Provence: Éditions Édisud.

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and Émile Licent

1925 "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 *L'Anthropologie* 35: 201-234.

1927 "Observations sur les formations quaternaires et tertiaires supérieures du Honan septentrional et du Chansi méridional."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中國地質學會誌 6.2: 129-148.

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and Jean Piveteau

1930 "Les mammifères fossiles de Nihowan (Chine)." *Annales de Paléontologie* 19.1-4: 3-134.

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and Pierre Leroy

1942 *Chinese Fossil Mammals: A Complete Bibliography Analysed, Tabulated, Annotated and Indexed*. Pékin: Institut de Géobiologie.

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and Pei Wen-Chung

1932 "The Lithic Industry of the Sinanthropus Deposits in Choukoutien."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中國地質學會誌 11.4: 315-364.

1944 *Le Néolithique de la Chine*. Pékin: Institut de Géobiologie.

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and Young Chung-Chien

1930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Pre-loessic and Post-pontian Formations in Western Shansi and Northern Shensi."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地質專報, ser. A, 8. Peking.（楊鍾健譯，《山西西部陝西北部蓬蒂紀後黃土期前之地層觀察》，收入《地質專報・甲種・第八號》，北平：實業部直轄地質調查所、國立北平研究院地質研究所）

1931 "Fossil Mammals from the Late Cenozoic of Northern China." *Palaeontologia Sinica* 中國古生物誌, ser. C, 9. vol. 1. Peking.（楊鍾健譯，《中國北部新生代後期之哺乳動物化石》，收入《古生物誌・丙種・第九號》，北平：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國立北平研究院地質學研究所）

1936 "On the Mammalian Remains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Anyang." *Palaeontologia Sinica* 中國古生物誌, ser. C, 12. Peking.（楊鍾健譯，《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收入《中國古生物誌・丙種・第十二號》，北平：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國立北平研究院地質學研究所）

Vallois, Henri

1941-1946 "Marcellin Boule." *L'Anthropologie* 50: 203-210.

Winock, Michel

1987 *Chronique des années soixant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Weidenreich, Franz（魏敦瑞）

1943 "The Skull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Palaeontologia Sinica* 中國古生物誌, ser. D, 10. Peking.

Young, Chung-Chien（楊鍾健）

1932 "On the Artiodactyle from the Sinanthropus Site at Choukoutien." *Palaeontologia Sinica* 中國古生物誌, ser. C, 8. vol. 2. Peking.

1934 "On the Insectivora, Chiroptera, Rodentia and Primates Other than Sinanthropus from Locality 1 at Choukoutien." *Palaeontologia Sinica* 中國古生物誌, ser. C, 8. vol. 3. Peking.

An French Adviser in the Time of Choukoutie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Study Based on the Recently Published Teilhard de Chardin's Correspondence

Li-Chuan Ta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natural sciences,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such as museums, which played a key decision-making role and performed multiple functions, have been largely explored.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rchives, fewer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researchers sent by the museums to collect the specimen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he nature of their fieldwork conducted abroad.

Based on the recently publishe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during his stay in China and his mentor, Professor Marcellin Boule,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circumstances of Teilhard de Chardin's initial mission to China, the motivations for his involvement in the Choukoutien (Zhoukuodian) archaeological project, and his interactions wi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archaeologists of his time. In the analysis, special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changes over time in the psychology and intellectual thinking of this French paleontologist who initially planned to conduct field work in China on a short-term basis, but later ended up staying in China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The analysis is confined to the period of time covered by this correspondence collection (1923-1940), whi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For the first period (1923-1927) in which Teilhard de Chardin worked in China as a chargé de missio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Paris, our analysis concentrates on three main aspects: 1) his loyalty towards, and dependency on, the French institutions that subsidized his fieldwork studies, 2) his reactions to the pressure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Chinese field, and 3) his initial ignorance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knowledge about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In the second period (1928-1940), Teilhard de Chardin was invited to serve as an adviser to paleontological research for the Choukoutien archaeological project, and gradually became an internationally known expert in Asian archaeology. During this period, he still depended, to a certain degree, on French reference

materials and expertise.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changes in Teilhard de Chardin's working conditions and status, the initial relationship based on patronage slowly subsided. Instead, Chinese fieldwork became the base for his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d he used this base to increase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in the field.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he attempted to establish reference standard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prehistoric culture by applying the gradually accumulated local archaeological data. In doing so, he no longer referred only to the European prehistoric frame of reference established in the 19th century which was based largely on local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case of Teilhard de Chardin in China points to the transformations over tim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earchers sent abroad to conduct field work and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a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research network. It also provides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observe how different pattern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researchers of China and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is case study thus offers basic insight and knowledge about French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aeology that could be useful for future comparative studies.

Keywords: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French paleontological mission, Choukoutien archaeological project

勘誤

二〇〇八年三月出版之第七十九本第一分〈周口店發掘時代的一名法國顧問——以新近出版的德日進書信集為基礎材料的研究〉，英文題名 “A French Adviser in the Time of Choukoutie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Study Based on the Recently Published Teilhard de Chardin’s Correspondence” 中之“A French Adviser” 誤植為 “An French Adviser”。謹在此向作者戴麗娟女士、各位學者先進及讀者致歉。